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119 期
2012 年 9 月 15 日

目 录

【论 文】

- 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 王 柯
- 20 世纪上半期日本的中国回教民族政策述论 曾凡云
- 共产主义中国之前的国民党、穆斯林军阀
和“开发大西北”运动 林孝庭著 卢云译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编者按】

日本政府9月11日悍然宣布“购买”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岛，彻底打碎了部分中国人对所谓“中日友好”的幻想。

其实，自1945年日本战败被迫投降以来，日本政客和**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并没有真正对日本在战时犯下的令人惊骇的反人类罪行有任何反省。日本政客多次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政府公开否认曾在中国实施的“细菌战”和“731部队”的存在，东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然是日本政客和国民参拜战犯、缅怀当年“杀戮战绩”的场所，当年曾飘扬在亚洲各地并用各国人民鲜血染红的日本“膏药旗”和“太阳旗”仍然是日本国旗和军旗。当一位欧洲学者向我表示，他对中国人近些年厌恶日本的情绪十分不解时，我曾经问他，假如当年纳粹的旗帜仍然飘扬在德国机构和德国使馆的上空时，你们有所感想？他表示那是完全不可接受和完全不可想象的。某些日本领导人试图以一句“添了麻烦”就想把上亿中国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一笔勾销”，实在是痴心妄想！

我在70年代后期曾看过一部日本电影《野麦岭》，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情节是日本的那些最下层的、任人欺凌的农村缫丝女工，居然为日本扩军备战踊跃捐献自己的血汗钱，并为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而欢欣雀跃。在侵华战争中，每个参军的日本青年，全家、全村人都为他们举行集体庆典式的欢送仪式。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几乎全体日本国民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的一场全民性的**对外战争**。日本报纸曾刊登一则头条新闻，一个刚刚结婚的日本新娘，为了丈夫可以“毫无牵挂”地到中国来杀人放火、“为国捐躯”，在送别丈夫参军后当天自杀，这成为日本社会激励青年投身侵略战争的最好的宣传素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一位八路军战地记者，曾对日军在华北“大扫荡”中的暴行进行过采访。一次当他走进一个刚刚被日军“扫荡”过的村子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几十具面目全非的村民尸体、烧毁的房舍，在村公所前的一口大锅里，他还看到了锅里活活煮死的两个婴儿，其中一个为村妇教会会长一岁半的儿子。他拍下了这一场景，这张照片后来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这位记者由于看到了太多这样的残忍场面，最后精神崩溃。旅美华裔女作者张纯如，在写作《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人当时在南京时的日记、照片和大量其他材料。许多人认为，她随后的自杀与受到这些史实材料的强烈刺激有关。在长达14年的时期内对一个邻国犯下这样大量野蛮和凶残罪行的一个民族，面对各国这么多的证人和证据，今天居然还能够对这些罪行道貌岸然地予以否认，甚至还摆出了一幅“二战受害者”的嘴脸。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我一直认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美国飞行员是应当受到全世界人民敬仰的英雄。不错，这两个城市确实有不少平民死亡。但是，这两颗原子弹导致了日本迅速宣布投降，要知道日本如果晚投降一天，在这一天的24小时里，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三百多万日军不知会杀害多少万当地的无辜平民？即使一百名日军平均一天只杀5个人，那么一天就会杀死约20万人。广岛、长崎死了些人，日本人觉得是天大的事。那么，亚洲各国民众的生命就不是生命吗？同时，这些满腔热忱地把自己的亲人送进日本军队到亚洲各地杀人放火的日本人，这些天天进行军事操练、准备为天皇“全岛玉碎”的日本人，难道就不应该受到战争的惩罚吗？一个杀人犯，偏偏还要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这是一种什么强盗逻辑？

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屠杀和各种残害最烈最深的国家，也是对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最为警惕的国家。在前几天与希拉里的会晤中，韩国总统李明博指出日本正

在走向极右主义，这是亚洲各国以致全世界需要密切关注的。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初期，美国袖手旁观，直到日本联合舰队在珍珠港把美国人打疼了，才开始意识到日本这个国家的基本性质。二战后的“冷战”思维又引导美国包庇日本战犯、保留日本原有体制，国歌国旗一律照旧。因此，战后的日本并没有像战后的德国那样完全脱胎换骨，在意识深处和骨子里依然是军国主义。美国人今天在钓鱼岛问题上依然偏袒日本，坚持继续扶植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将其作为“围堵中国”的棋子，这与二战前期希望将日本作为“围堵苏联”棋子的思路同出一辙。我相信，日后美国必然会自食其果。

今年5月初石原慎太郎鼓吹要“购买”钓鱼岛，组织了日本国民的网上投票，绝大多数网民表示赞成。一些旅美中国学者发起中国人的网上投票，表示抗议。我无意中把这一信息转发给了一位印地安纳大学的美国学者 Gardner Bovingdon（中文名字鲍文德），他居然对这一信息中的“日本鬼子”一词表示强烈谴责。我回复他：很不幸，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既然他不能接受，那么以后我也不必再与他交往了。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至少我有权利表达出我心里的愤怒，也有权利选择我与什么人交往。

据《中国青年报》9月14日报道，“不分左右，绝大多数日本人支持所谓‘国有化’。……时事通讯社8月中旬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野田政府的所谓‘国有化’方针也得到了相当高的支持率。有73.7%的民众支持日本中央政府出手‘购岛’而将钓鱼岛‘国有化’，反对者只占10.8%”。**中国民众不仅不能对日本政客抱任何幻想，也不要对所谓的“日本人民”抱任何幻想。**即使日本还存在对战争认真反省的老人，那也是极其少数的个案，完全无法影响日本政局和“民意”的走向。对此，全体中国人必须永远保持头脑的清醒，**在对日交往中，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原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先生今年2月15日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曾谈到日本人对二战的态度，他特别指出：“他们害怕承担责任，**那是个自私的民族**，这一点和德国不同”。这句话一针见血。

二战期间，希特勒和纳粹德国人在欧洲各国犯下骇人听闻的残暴罪行，特别是对600万犹太人的虐杀，使犹太人至今耿耿于怀。但是，战后国际法庭对德国的战争罪犯进行了全面的审判和惩罚，纳粹的党旗和军旗销声匿迹。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而被认为是对华友好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提到二战时却仅仅说了一句“添了麻烦”。与此同时，日本坚持拒绝对战时来自中国的强迫劳工和各国“慰安妇”给予道歉和赔偿，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前往卢沟桥和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什么全世界民众都认为德国人对战争罪行有真诚的悔意，而对日本人始终不予信任，把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战后的表现做一个对比，原因不是十分清楚吗？

本期《通讯》中有两篇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如何开展“回教工作”的论文，介绍了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灭亡中国在西北地区以穆斯林军阀为对象开展的分裂活动。这些历史，今天的中国人对之几乎毫无了解。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可以让中国人特别是西北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认识到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如第一篇文章的作者忘柯教授所说：“搞清楚这一事实，不仅可以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本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历届中国政府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加强边疆地区居民以及有着其他历史文化背景的民族共同体之国民意识的原因”。

马戎

2012年9月15日

【论 文】

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¹

王 柯²

1938年7月8日，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周年之际，日本政府“五相会议”³通过一份指导性纲领——《时局的发展与对支谋略》，确定了对华军事战略、政治攻势（如分化中国内部政治势力等）和加强在华经济掠夺以支援战争等加快侵略中国步伐的六条方针。其中的第四条为：“推进回教工作，在（中国——引者）西北地区设立以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地带。”⁴对于日本在战争时曾经推进“回教工作”一事，日本的历史学界几乎无人提及；而在中国的历史学界更是鲜为人知。然而，通过日本防卫研究所所藏战时日本陆军档案、日本外交史料馆和日本国公文书馆所藏战时外交档案，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20世纪初，日本就已设想向中国的“回教徒”进行渗透，以为日后日本侵略中国所用。⁵而在发动了侵华战争后，日本又具体制定并积极实施了“回教工作”。因此，搞清楚这一事实，不仅可以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本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历届中国政府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加强边疆地区居民以及有着其他历史文化背景的民族共同体之国民意识的原因。

一、日本关注中国“回教”的出发点

1890年代，有二三位在海外接触到伊斯兰教的日本人皈依伊斯兰教，但尽管如此，日本国内并不存在一个穆斯林群体。直到进入20世纪，日本才开始关注伊斯兰教。这种关注，与宗教信仰无关，完全是出于官方的、即外务省及军部的政治需要。1905年5月，一位名为樱井好孝的人，“接受外务省的秘密命令，到新疆至蒙古一带进行旅行和视察”，“行程约二万余千清里”。第二年十二月回到日本以后，他就内蒙和新疆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居民成分、宗教信仰和商业等情况向外务省提交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⁶而从外务省于1906年1月16日向茨城县厅申请推迟对樱井好孝的征兵命令一事来看，樱井好孝应是日本外务省的属员。⁷另外，1910年，日本外务省的调查员中久喜信周，也对河南省的“回教徒”情况进行了调查。⁸

1913年，日本关东都督府将其霸占地域划分为大连民政署管区、旅顺民政署管区、金州民

¹ 本文刊载于《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87-105页。

²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历史学教授。

³ 由总理大臣（简称首相）、陆军大臣（简称陆相）、海军大臣（简称海相）、大藏大臣（简称藏相）、外务大臣（简称外相）于1933年组成，主要就日本陆军和海军提出的所谓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军事问题决定大政方针。

⁴ 《時局ニ伴う対支謀略》，昭和十三年七月八日，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 対支那国/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十四卷2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2030540000，文件名为《時局に伴う対支謀略》。

⁵ 本论文所使用的日本防卫研究所所藏战时日本陆军档案、日本外交史料馆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战时外交档案，虽有一部分为笔者过去直接查阅，但近年来随着日本档案公开工作的进行，大多可以通过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的档案查询阅览系统查阅到。因此，为了方便读者查询，本文在使用此类档案时全部统一为按照JACAR系统查询编码方法注明出处。

⁶ 桜井好孝：《蒙古視察復命書》，明治四十年一月，外務省記録/1門 政治/6類 諸外国内政/1項 亜細亜/蒙古边境視察員派遣一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3050331800。

⁷ 《公第一三四号 受第一三四七号 現役兵証昼並ニ抽籤札領収昼廻送ノ件》，明治三十五年十月十日，外務省記録/5門 軍事/1類 国防/2項 兵役/本邦人徴兵関係雜纂 第十七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7090106700，文件名为《桜井好孝、芝田辰治》。

⁸ 《中久喜信周調査 河南ノ回教徒》，明治四十三年十月，調書/調書/政務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2130561800。

政支署管区、瓦房店警务支署管区、大石桥警务支署管区、辽阳警务署管区、奉天警务署管区、抚顺警务支署管区、安东警务署管区，“按照神道、佛教、基督教、道教、回教之类”进行了详细的“宗教调查”。关东都督府为关东军的前身，担任其历任都督的都是现役大将或中将，但是从这项调查报告来看，在当时关东都督府所管辖的所有地域中，“回教”的势力微弱，仅仅在金州民政支署管区内的“皮子窝所辖区内有一寺，几近毁灭状态”。¹

1918年3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有在库伦、新疆方面扩充情报网的必要”，于是使用“临时军事费”，²“在支那驻屯军谍报担任地域内分别设立谍报机关”，“在张家口方面，有该地三井洋行出張所员宫崎嘉一，虽无军事方面智识但却办事可靠；陕西西安方面，派遣军队司令部翻译吉田忠太郎前往；新疆迪化方面，派遣在乡军人下士佐田繁治前往，以宗教研究为目的，同时进行谍报活动；在外蒙古库伦方面，有居住在库伦的日本人驹田信夫，最近接受了进行谍报工作的委任”。³另外，还向“天津及其他驻屯地”、“西安或太原”“配备军官或其他能干的间谍”，并“预定向张家口派遣军官”。可以看出，这些被指定优先派遣的地区，多在中国西部、北部或边疆地区的中心城市。日本军部之所以扩充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情报网，其主要目的为：“随时局进展，侦探俄德设在支那西北边境的设施，以便及时采取共同行动阻止。”⁴但是，日本军部的行动，还隐藏着另外的目的。例如，佐田繁治在新疆“以宗教研究为目的，同时进行谍报活动”。因为新疆居住着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在这里进行“宗教研究”，重点当然只能是伊斯兰教。笔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的内阁公文中发现，1873年7月15日出生于岛根县的在乡军人（即预备役）下士佐田繁治，在此之前是殖民地台湾警察，并非宗教研究家。⁵

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关注，并非出于偶然。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对于“回教”的关注，原本就与侵略亚洲目的有关。⁶其关心所在，可以从刊行于1922年8月大林一之执笔的《支那的回教问题》中看出。大林对中国伊斯兰教进行研究的目的，说到底是在研究“回教”在中国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上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他在这本书的最后这样写道：“我认为，富于煽动性，并具有雷同性，在特殊地域里成为特殊潜在势力的支那回教，在现今的形势之下就是支那的癌症。但是，除非到了支那自身被解剖手术切开之时，是无法将其剔除出去的。而因其病情发展非常缓慢，若没有来自外部的冲击就不会发生急激的病变。”也就是说，大林的结论是，“回教”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的一个分裂因素，值得日本积极加以利用，进而他提出：“支那的回教，根据对它如何进行利用，可以使其在调整整个远东问题上发挥出一种有力的作用。”⁷大林一之的这本小册子由青岛守备军陆军参谋部刊行，出版后被分发给军部与政府各有关部门，而当时大林一之的身份为“军嘱托”（军方委托进行研究人员）。这说明，大林的调查、研

1 《宗教ニ関スル一般ノ状況》，大正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外務省記録/1門 政治/5類 帝国内政/3項 施政/関東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 第九卷4；大正二年度《諸般政務施行成績 関東都督府》8 / 第六。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3041562800。

2 《臨時軍事費使用ノ件》，大正七年四月，陸軍省大日記/歐受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C03024894800，文件名为《臨時軍事費使用ノ件》

3 《諜報機關配置ノ件報告》，大正七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密大日記 4冊の内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C03022435700，文件名为《諜報機關配置ノ件報告》。

4 《蒙古及新疆地方諜報機關配置ノ件》，大正七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密大日記 4冊の内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C03022436400，文件名为《蒙古及新疆地方諜報機關配置ノ件》。

5 《台北県属滝九郎外三十一名召集免除ノ件》，明治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内閣公文雜纂/第二十五卷《台湾及府県一》。国立公文書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A04010047100，文件名为《台北県属滝九郎。鳳山県巡查予備陸軍歩兵上等兵佐田繁治外十名。台北県弁務署主記後備陸軍砲兵一等軍曹門芳太郎外二名。台北県属後備陸軍一等書記加藤亮。台南県巡查後備陸軍…》。

6 白杵陽《植民地政策から地域研究へ》（帝國主義と地域研究[報告一]）、
<http://repository.tufts.ac.jp/bitstream/10108/26300/1/cdats-hub三-三.pdf>

7 《印刷物送付之件通達》，大正十一年八月三十日，陸軍省大日記/歐受大日記，大正11年《歐受大日記自8月至09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C03025355100，文件名为《印刷物送付ノ件》（已核无误。该文件为该档案第一个文件，但原文件时间标注与档案时间标注方法不统一）。

究和出版都是遵从军部的意愿、使用军部的资金进行的。

1922年11月，外务省情报部购买了山冈光太郎于1909年出版的44本《回教的神秘威力》，分发给外务省的局长、课长，以及向南美洲地区输出移民的各地方府县政府，并发出通知要求学习有关伊斯兰教的知识。¹ 山冈光太郎，被称为是第一位到麦加进行朝觐的日本人。关于他之所以到麦加进行朝觐的背景，有日本研究者指出：“他并不是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进行了这次旅行，毋宁说这就好像是一次与宗教没有任何缘分的冒险旅行。说得更深刻一点儿，那甚至不是一位身贫如洗的青年自发的冒险旅行，而是接受了军部的指示进行的麦加朝觐。”² 虽然目前还没有原始资料来证实这位日本研究者的指摘是否属实，但是通过日本军部的各种作为可以肯定，他们极其关注伊斯兰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田中逸平是第二位到麦加朝觐的日本人，他是在中国青岛的日本驻屯军中供职期间改信伊斯兰教的。“支那回教研究家”若林半，在他1935年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的履历书中这样回忆道：“大正五年（即1916年——引者）时，我去到青岛陆军访问翻译官、同志田中逸平氏（故人），共同谈起东亚的百年大计，我恳请他改宗为回教徒以研究支那回教。在促使该氏下定了决心，并互约定顺从天意之后，我回了国。”若林半在吹嘘自己的功绩时甚至说道，田中逸平之所以在1924、1935年两次去麦加进行朝觐，就是因为他的劝说。³ 田中逸平是作为日本陆军的翻译官随着日本的“山东占领军”（又称“征胶军”）来到山东省的。之后他一边挂着东京国民新闻社特派员的头衔，又一边从1917年开始在山东省筹备创办中文报纸《济南日报》，并担任该报主笔。

设立报社并非是一件易事，不仅需要通过各种审批，而且需要大量设备和资金。但是，田中顺利地设立了报社，缘由是他得到了日本驻屯军的支持：“设备费由当时的军政长官吉村健藏氏出面，说明田中等为军政尽力之事，说服青岛鸦片局刘子山出资约一万元”。而田中逸平之所以能够得到占领军的信赖和支持，就是因为他办报的目的是在中国制造对日本有利的舆论，以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顺利实施：“从经营山东的目的出发，操纵支那人，创立一个强有力的汉字报社”，以便“在解决山东问题乃至其后”的“帝国的北支那经营”（即如何将华北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问题）上，“常常对时局问题直接产生影响”。⁴ 有日本研究者认为田中逸平之所以改信伊斯兰教，不是“企图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利用伊斯兰教”，而是“试图理解伊斯兰教的本质，在兴亚的理想基础上尝试与伊斯兰教进行交流”。⁵ 在没有看到以上田中逸平在青岛活动记录的情况下，这位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缺乏依据。

二、活跃在中国“回教”界的日本人

与田中逸平有着亲密关系的“支那回教研究家”若林半，其在中国的活动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1935年9月，若林半带领两名弟子，用了大约两个月时间，访问了上海、南京、青岛、

1 《山岡光太郎著〈回々教の神秘的威力〉購入ノ件》，大正十一年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外務省記録/1門 政治/3類 宣伝/1項 帝国/宣伝関係雑件/囑託及補助金支給宣伝者其他宣伝費支出関係/本邦人ノ部 第三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3040728100，文件名为《山岡光太郎 回々教ノ神秘的威力 購入ノ件》。

2 田中逸平在进行第二次朝觐时去向不明。坪内隆彦：《イスラーム先駆者田中逸平試論》，http://www.asia2020.jp/islam/tanaka_shiron.htm

3 《支那回教研究家 若林半、郡正三、細川將ノ三名ニ対シ北部支那及滿洲国視察手當補給ニ關スル高裁案》，昭和十年九月十日起案，九月十一日決裁，外務省記録/1門 東方文化事業/6類 講演、視察及助成/本邦人滿支視察旅行関係雑件/補助実施関係 第二卷3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5015680800，文件名为《支那回教研究家 若林半、郡正三、細川將 昭和十年九月十一日》。

4 《漢字新聞 濟南日報社内証ニ就テ》，大正八年六月，外務省記録/1門 政治/3類 宣伝/1項 帝国/新聞雜誌操縦関係雜纂1/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3040600500，文件名为《1/3 大正6年6月から大正9年5月12日》。

5 坪内隆彦：《イスラーム先駆者 田中逸平・試論》http://www.asia2020.jp/islam/tanaka_shiron.htm

济南、天津、北平、归化（呼和浩特）、太原、热河（承德）、奉天（沈阳）、新京（长春）、大连等地，这次旅行的名目为“调查中国的回教政策及情况，并与之进行联络”。而调查和联络活动所使用的经费，来自于日本外务省支出的“补助费”（五百元）。¹1939年1月10日，若林半以“日本名人”的名义，来到日本军占领下的北京，视察设立在此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并且进行了“训示”。²

战争初期，在被日本军队占领的许多地区，都先后出现了各种“回教徒”的团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团体的设立过程中，都能够看到日本人的身影。最初的“回教徒”团体，是1934年末设立的“满洲伊斯兰协会”，它在“伪满”各地共有166个分会。³该团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强大网络，就是因为日本侵略当局给予了极大支持。按照当时日本外务省调查部一位属员的报告，在该团体设立的过程中，“尽了最大努力的是一位名为川村狂堂的日本人”。川村狂堂（名为川村乙磨，狂堂为其号）被推为该协会的总裁，在他指挥下，这个会员达一万人以上的协会，积极支持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政策。例如，伪满洲国实施“帝制”时，协会“率先鼓吹宣扬王道立国与满洲建国的精神”，“赞扬友邦日本的仗义援助”。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穆斯林发出“抗日”号召后，该协会立即向各分会发出通知：“阐明发扬满洲建国精神、加强日满两国一德不可分关系之意义，以及不可反满抗日之理由和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教义二者不可共容之道理，以此来引导在满回教徒。”当七七事变发生后，该协会又向“全满信徒”发出“谕告”，宣称日本的侵略行动，“不外是友邦日本为了维护东亚和平大义，而派出了正义之师”。⁴

据说，川村狂堂是受日本黑龙会的派遣来到中国的。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他一直活动在中国西北各地，大约是在北京或新疆改信了伊斯兰教，曾经在甘肃省因为与“穆斯林叛乱”有关而被当局当作“军事间谍”逮捕过。⁵事实说明，川村狂堂具有日本军部的背景。

1937年12月，日本外务省调查部举行第一次“回教研究会”报告会。会上，日本外务省欧亚一课“嘱托”今冈十一郎⁶当着11位外务省官员、3位陆军省军官、4位海军省军官的面，就以上所言及的活跃在中国“回教”中的日本人，做了如下陈述：“人们都说，在我国人中的回教徒已经为数不少。而在我看来，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在这种人中间，从过去就有名的人大致如下：山冈光太郎（在印度接受了洗礼）、田中逸平（死亡）、中尾武男（现任驻土耳其大使馆嘱托）、川村乙磨（号狂堂，在奉天，在回教徒中有权威）、波多野鸟峰（曾经在赤坂设立回教寺院）、冈本甚伍（跟从库利班加里接受洗礼，以世界旅行者而知名）、有贺文三郎（跟从神户的诺下姆古诺夫接受洗礼），之外年轻的还有小林（在爱资哈尔大学）、山本、铃木、

1 《支那回教研究家 若林半、郡正三、細川將ノ三名ニ対シ北部支那及滿洲国視察手當補給ニ關スル高裁案》，外務省記録/H門 東方文化事業/6類 講演、視察及助成/本邦人滿支視察旅行關係雜件/補助實施關係 第二卷32。

2 中国回教联合会华北联合会总部编：《中国回教联合会第一年年报》，北京内部出版发行，1939年2月，31—32、42、45—49、89、93页。

3 回教圈考究所编：《回教圈史要》，东京：四海書房，1940年1月，300页。

4 《滿洲の回教》，昭和十三年年二月七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533400。

5 杨敬之：《日本的回教政策》，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23页；保坂修司：《アラビアの日本人 日本のムジャーヒデーイン》，《中東協力センターニュース》，45—49页。

<http://www.jccme.or.jp/japanese/11/pdf/11-05/11-05-41.pdf#search=>（已核，是我重复了）

6 今冈十一郎（1888—1973），出生于日本岛根县，1914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德语专业，后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留学，1931年回到日本后，作为“嘱托”进入日本外务省欧亚局一课，并担任“日本匈牙利文化交流协会理事”，成为当时日本推动图兰主义（Turanism，即提倡欧亚大陆各民族联合）的主要人物，其关于匈牙利历史文化的著作颇丰。关于他在“日本匈牙利文化交流协会理事”的活动，参见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1類 文化、文化施設/本邦ニ於ケル協会及文化団体關係雜件/日洪文化連絡協議會關係2. 第二回會議（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4012424900。

乡等人。”“作为个人的行为，还有若林半在做支援输送青年去到麦加进行朝觐的活动。”¹ 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这句话真可谓入木三分，准确地道出了这些人进行伊斯兰教活动的本质。

在当时的察哈尔省府所在地张家口，1937年11月22日成立了“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虽然名为“文化协会”，但是从7名一般干事均为各地清真寺的“教长”（伊玛目）这一点来看，该协会应该是一个由中国伊斯兰教信徒组成的宗教社会团体。而从12月18日日本驻张家口总领事代理松浦给广田外务大臣发出的机密电报可以看出，这个中国伊斯兰教信徒的团体一开始就是由日本人计划设立的。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透露：“本次事变爆发以来，军部为了防止苏联势力对从外蒙方面到内蒙及西北支那一带的渗透，在这一带遏制和排除共产主义的侵入而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正在进行中的对各地回教徒的怀柔，以及策划掀起排苏反共运动。上个月的十一月中旬，松林亮从奉天、山口从天津来张（家口），与特务机关取得联系，在当地纠合居民中的回教徒，于上个月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本市市民大街清真寺召开了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成立大会”，“特务机关、察南自治政府代表及顾问以及其他各机关的代表均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选举的5名协会顾问中，居然就有“松井特务机关长”、“金井蒙疆联合委员会顾问”和“田中察南政府代表”等4名日本人。²

在热河省省会承德，1938年5月7日成立了“防共回教徒同盟”。成立大会上，由“当地防共同盟本部首脑（日本人）”、即“同盟总裁”花田仲之助与“同盟长”张子文两人联名发表了“伊斯兰教教徒反共同盟宣言”。³ 同盟“网罗了鹤冈长太郎、重松又太郎、甘粕正彦、高桥水之助、十河信二、鲇川义介、土方宁、前田照城（驻承德五军宪兵队顾问、后备陆军大佐）、大川周明等与回教有关的知名人士”，来做同盟的顾问。⁴

在成立“防共回教徒同盟”的过程中，最为活跃的是“作为志士而闻名的退役中佐”花田仲之助（1860-1945）。⁵ 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长期活动于中国东北。根据山名正二所著《日俄战争秘史 满洲义军》一书，1897年4月，时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军官的花田，为了搜集军事情报，曾受命扮作日本西本愿寺的僧侣潜入海参崴，以清水松月的假姓名潜伏了三年之久。花田归国之后被编入预备役，于1901年成立了以天皇“教育勅语”为基本理念的“报德会”，在日本各地广为宣扬“知恩报德·感恩报谢”精神。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花田接到征集命令，被任命为熊本步兵第二十三连队第一大队长，但在一个星期之后又被调往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被任命为“参谋本部属员”，受命组成一支在敌后收集情报和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别部队。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支援下，花田仲之助率领由他亲自选拔的8名步兵、工兵，加上7名玄洋社成员，组成了一支16人的“特别任务队”，进入中国东北辽东地区，⁶以“满洲

1 《回教研究会、外務省欧亞局第一課今岡囑託報告》、《報告（續）欧亞一課今岡囑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至十二月十三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一卷、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33200。

2 《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協會ノ組織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1類 文化、文化施設/各国ニ於ケル協會及文化団体關係雜件/中国ノ部5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396100。

3 《第一七号（部外極秘）》，昭和十三年五月九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2。滿州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300。

4 《第一六号（部外極秘）》，昭和十三年五月九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2。滿州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300。

5 《第一五号極秘》，昭和十三年五月七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2。滿州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300。

6 山名正二：《日露戦争秘史 满洲義軍》，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一节，月刊满洲社東京出版部，1942年9

义军”的名义纠集了“满洲马贼”，从背后对俄军反复进行攻击。有人说，“满洲义军”在日俄战争结束时，已经发展到一千人以上。¹ 因为“满洲义军”劳苦功高，“义军总统”花田仲之助在战后受到日本军部的表彰。²

日俄战争以后，花田仲之助再次被编入预备役，³ 但依然与军部保持着密切联系。1936年5月和11月，花田仲之助作为报德会会长，两次搭乘日本军舰（乌苏里丸和扶桑丸）来到“满洲”进行视察。⁴ 在“满洲”，花田主要以“报德会”的名义进行活动，据说在各地受到热烈欢迎。⁵ 其中缘由，不仅是因为过去“满洲义军”时代的影响力，应该还与他和日本关东军以及情报机关关系密切有关。根据为《日俄战争秘史 满洲义军》一书执笔作序的大本营陆军报道部长、陆军大佐谷萩那华雄的回忆，花田来“满洲”时，他正在奉天特务机关作机关长土肥原少将（写作序言时已升为大将）的辅佐官，1936年秋的某一天，花田仲之助来到该机关，要求搭乘关东军的飞机。⁶ 1941年11月，“第十三届大阪府下报德会联合大会”召开之际，花田甚至打电报给当时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要求他给大会发贺电。这些事实证明，花田与日本军部之间有特殊的联系⁷。

三、驻屯日军的“特务机关”与“回教”团体

无论是“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还是“防共回教徒同盟”，当时中国许多地方伊斯兰教团体的成立与运营，都与侵华日军的“特务机关”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1月13日，日本驻张家口森冈总领事向有田外务大臣拍发绝密电报，提到“蒙疆”的“回教徒”有“五万至七万”之多，并进一步补充道：“为了操纵和指导这些回教徒，并以此为基础密切联络居住在西北五省的回民族，在蒙疆政权刚刚成立之初，已经根据军部的设想，前年十一月已经在张家口成立了西北回民族文化协会”，“对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回教青年进行精神训练，并在各地清真寺附属的阿拉伯语小学中增设了日语科目”；“上述各项工作由特务机关专门负责，（蒙疆）联合委员会只不过支出经费而已”。⁸

此外，日本驻承德草野代理领事在向广田外务大臣拍发的“绝对保密”的电报中，对于成立“防共回教徒同盟”的意义作了如下解说：“一，与满洲国的二百万回教徒保持联络”；“将该地作为回教徒的防共本部，并以此为中心，不仅与满洲国的而且与一千万支那回教徒进行团结，支援五马联盟，力图与中亚各国回教徒取得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政治工作员（即义勇军）进行武装，首先支援五马联盟，使其从蒋政权中完全独立出来，然后进入中亚，促使该地区各国

月。

- 1 于泾：《有关东北伪军的几个历史问题》，《文史长廊》2005年第5期。
- 2 《勲劳確認書》，明治三十七年六月四日，陸軍省大日記/日露戰役《勲劳確認書等控綴 明治三十七年五月以降 大本營陸軍副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C06041013000，文件名為《陸軍歩兵少佐 花田仲之助》。
- 3 《召集解除人名別紙及通報候也》，明治三十九年二月，陸軍省大日記/日露戰役/《臨号書類綴 參謀本部副官管》。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C06041300300，文件名為《歩兵中佐花田仲之助外一名召集解除の通牒 陸軍省副官他》。
- 4 《便乗許可ノ件》，昭和十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滿機密・密・普大日記/陸滿普大日記《滿受大日記（普） 其 5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C04012142300，文件名為《便乗許可の件》。
- 5 《報德会幹事花田退役中佐離通二関スル件》，昭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外務省記録/I 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4 類 労働及社会問題/国民思想善導教化及団体關係雜件 第二卷 3. 報德会關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3004800。
- 6 谷萩那華雄：《山名正二著〈日露戰爭秘史 滿洲義軍〉序》。
- 7 《祝電依頼ノ件》，昭和十七年，陸軍省大日記/壹大日記/《壹大日記第 9 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C04014965200，文件名為《祝電依頼ノ件》。
- 8 《第六号ノ一（部外極秘）》，昭和十四年一月十三日，外務省記録/I 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 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3. 中国 分割 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50400。

独立或排除第三国的影响，在皇国之慈光下完成东洋的皇道联盟”；“预定最近向新疆和阿富汗方面派遣工作人员（日本人）”。¹ 并补充道：“为了方便与参谋本部取得联络，该会干部渡边清茂和安田德助（均系教务会热河省本部职员）二人于八日由当地出发进京，为了与关东军取得联络，该地的特务机关长荒木大佐于九日出发前往新京。”²

对“同盟”的“第一次实施计划”，草野代理领事给予了高度评价：“据我观察，不仅内容上立意周到、组织具体，而且方针甚为精细。为了保证日本的大陆政策得以迅速顺利开展，不仅准备支援支那边境西域地区回教徒的反共政治独立运动，甚至还支持近东各国的民族解放和印度的独立运动。值得注目之点为：（一）实施要领规定：1，该项工作要始终与当地作战兵团的对回教工作保持一致；2，坚持不懈工作以强化和推动世界回教徒军的自发奋起，根据这一原则，重视回教徒揭竿而起，在表面上最大限度地避免军部进行指导（的印象）；3，鉴于本项工作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要警惕不良分子进行策反，重视对人员的选择工作；4，关于本项工作的宣传活动，积极组织和利用民间的宣传网络，原则上排除官方宣传……（三）组建由回教徒独自参加的义勇军，编制为从第一军到第四军；（四）确保与我方大本营及内阁的秘密联络。”关于组建“义勇军”一事，“决定在承德特务机关的指导下”，第一次招收 5000 人；“关于派遣方法，遵照关东军的指示，另外单独做出计划，以期支援支那西域回教徒的独立”。最后特意强调“对于本项计划，承德特务机关长甚至牺牲自己的时间，始终给与了全力支持”。³

1938 年 2 月 7 日，“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日本方面职位最高者为“北支那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少将；就任联合会“最高指导者”的是北京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在“联合会最高指导及委员名系表”中，名列联合会主席之前的为茂川秀和特务机关长，以及主席顾问高垣信造。“联合会”开设了日语学校，根据茂川秀和特务机关长的指示，联合会 4 月 9 日设立了“回教青年训练所”（回教青年团），第一年招生 3 期，共训练了 47 名伊斯兰青年。在毕业仪式上，有毕业生慷慨陈词：“组建回军，正值今日”，由此可以推测：对这些青年也进行了配合日军活动相关的训练。“联合会”得到日军的支援之后迅速扩张，一年之间设立了北京、天津、济南、太原、张家口、包头、河南等 7 个地区本部，成为一个拥有 389 个分会的庞大组织。⁴

“特务机关”是归属驻扎于各地的日本侵略军的组织。从很多现象可以看出，有关中国“回教”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由日本侵略军负责。例如，1938 年 9 月到 10 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原文如此——引者）组织的“回教徒访日视察团”对日本进行了访问。团长虽然是由当地的“回教徒”担任，但两位“指导者”则均系日本人，其中一人还是“特务机关员”。引人注意的是，负责接待这次访问的并不是日本政府外务省而是陆军省。此外，1939 年“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回教徒代表团”出席“东亚回教徒恳亲大会”及“回教展览会”时，同样也是由日本陆军省负责接待。⁵ 根据“大日本帝国张家口大使馆事务所”提交的名单，1944 年 3 月时“蒙古自治邦”中央机关聘请以及已经退职的日本职员共计 236 人。从该名单来看，这些日本职员以前从事的职业五

¹ 《第二〇号（部外绝对极秘）》，昭和十三年五月十日，外務省記録/I 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 / 2 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雜件 / 回教関係 第二卷 2. 満州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300。

² 《第一六号（部外极秘）》，昭和十三年五月九日，外務省記録/I 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 / 2 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雜件 / 回教関係 第二卷 2. 満州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300。

³ 《第一五号极秘》，昭和十三年五月七日，外務省記録/I 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 / 2 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雜件 / 回教関係 第二卷 2. 満州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300。

⁴ 中国回教华北联合会总部：《中国回教联合会第一年年报》，31—32、42、45—49、89、93 页。

⁵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催回教徒访日视察团ノ見学ノ件》，昭和十三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支機密・密・普大日記/陸支密大日記，55 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C04120561300，文件名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催回教徒访日视察团の見学の件》。

花八门。但是“回教委员会”的5名日本人顾问中，除了1名女性之外全是现役军人。¹

1938年4月，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外务省为中心，陆军和海军相关人员组成的“回教及犹太教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制定“回教对策”为“急务”。²8月该委员会又向内阁总理大臣以及各大臣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回教对策的报告”强调了“与分布在亚细亚大陆回教徒建立友好亲善关系，以确保从背后对支那进行牵制”的重要性。³当年9月，外务省情报部制定了《支那事变后情报宣传工作概要》，提出“作为外务省，在情报、宣传和谋略问题上不分对内对外”的方针，规定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工作的目的为：“广泛收集情报，以至于了解支那的抵抗能力、各国的援助情况、人心动向”。并且做出下述具体决定：“由民间某团体开设研究所，以培养优秀的谍报人员”；在中国构筑“北支”、“中支”和“南支”三张情报网；在驻北京、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领事馆中增设情报主任、调查研究班和谍报工作班，其工作任务为：“侦查并粉碎（苏联和中共的）妄动”、“防止和镇压由国民政府进行的策反”、“监视政局和民众的动向”。⁴事实上，日本外务省在中国建设情报网的工作在此之前早已开始。如1922年5月，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就已经雇佣了“一名支那人作为谍报人员”。⁵

总之，日本外务省不仅非常重视在中国开展“回教工作”，而且具有与“回教徒”打交道的能力。但是，通过以下各种实际活动可以看出，日本在中国的“回教工作”一直是由驻扎在当地的侵略日军负责。

1939年3月，在属于蒙疆联合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日本“驻蒙军”）的管理范围内的包头，发生了“文化学院”（内设“回教青年日语学校”以及附属夜校）由于接到“驻蒙军”“命令离开”的“谕示”而不得不停办的事件。这座学校的教员是森、菅沼两位日本人（档案中只有两人姓氏，未记全名——引者）。按照日本驻张家口的森冈总领事的说法，这件事的起因为：文化学院由以“满洲国”的热河省为根据地的“防共回教徒同盟”经营，“其一部分经费由满洲国协和会本部支出，而且和回教同盟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违反了驻蒙军的方针进行工作”，“此外，当回教本部由承德迁往包头之际，他们没有与驻蒙军及蒙疆联合委员会联系，而直接与东京的中央军部进行联系等，事后被察觉”。⁶由此可知，在侵华日军中存在以下原则：即便是遵循日本政府“回教工作”方针开展的事业，与“回教”相关的一切事项均属于驻屯当地的日本军队的专管事务，必须接受他们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所以，当与“满洲国”方面有联系的回教机关进入“驻蒙军”的管辖地域时，尤其是他们绕过“驻蒙军”而直接与东京方面发生联系之事被发觉后，就遭到了

¹ 《昭和十九年三月現在 日系職員名簿》（其一），昭和十九年三月，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6類 諸外国内政/1項 支那国/滿蒙政況關係雜纂/蒙古連合自治政府官吏録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2031793100。此一時期蒙古聯邦自治政府名稱多變，1937年10月成立的蒙古聯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1941年8月再改名為蒙古自治邦。此處原文為蒙古連合自治政府。

² 《回教対策樹立ノ急務ニ就テ》，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33600。該文件未注明時間，但是從本文內容及同卷其他文書上來看，應該是昭和十三年四至五月的檔案。

³ 《回教対策樹立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八月，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33600。

⁴ 《支那事变ニ於ケル情報宣伝工作概要三》，昭和十三年九月，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 對支那国/支那事变關係一件/輿論並新聞論調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2030585300。

⁵ 《張家口領事謀報者雇用ノ件》，大正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外務省記録/1門 政治/3類 宣伝/1項 帝国外交關係雜件/囑託及補助金支給宣伝者其他宣伝費支出關係/外国人ノ部 第八卷 1 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3040747200。

⁶ 《第七九号（部外極秘）貴電第三五号ニ関シ（《イسلام》）同盟ニ関スル件》，昭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3. 中国 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50400。

“驻蒙军”的驱除。

四、“回教工作”中的“回教徒”军阀

在日本对中国“回教工作”的构想中，经常出现“五马联盟”一词，指以西北地区为根据地的五名“马”姓“回教徒军阀”的联盟，但是从这些关于“回教工作”的档案文书中至今没有发现一件日方所指“五马”究竟是哪五位“回教徒军阀”的文件。中国国内也有“五马”之说，但随着时代的不同，所指人物有所不同。民国初期的“五马”是指甘肃省督军马福祥、宁夏护军使马鸿宾、甘边宁夏镇守使马麒、凉州镇守使马襄廷和甘州镇守使马麟；而20世纪30年代的“五马”是指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以临河地区为中心的中央军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以凉州为根据地的中央军新编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活跃在甘肃西部的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马仲英。这些“回教徒军阀”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组成过一个政治联盟。此外，“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认为“中国回族中军事方面的实力派人物”为西北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芳、马麟，以及原籍桂林的白崇禧（国民军总参谋长）。¹

1938年12月13日，日本驻厚和（呼和浩特）领事胜野敏夫在向外务大臣提交的报告中，对“回教军”进行了详尽分析：“虽然一般将其称为回教军或回教将领，但实际上却与分散驻扎在各地所谓的军阀之间并无太大差异，称他们为回教军阀也并不为过，他们当中并没有真正打算提高全体回民生活水平之人。因为当地居民经常受到他们的盘剥和压榨（对于汉族犹甚），所以并无一人一直全面得到当地居民（回民）的支持。”他还逐一评论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和马仲英的实力、人格和在民众中的声望：“1，马鸿逵：典型的军阀将领，只对保持自己的势力有兴趣，长期对当地居民进行残酷剥削，在回民和汉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声望……因此居民中的有识之士及其部下中的不满分子等私下均有欲排除马鸿逵的迹象。居住在厚和方面的天主教神父等也认为他为人反复无常，难以信任”；“2，马鸿宾：在当地居民中有相当声望（在外国人中也是如此），而且得到部下深厚信赖”；“3，马步芳：推行仁政（虽然在青海那种地理条件下难以做到），以回民为首，在蒙古人中也有很高声望。我认为他是将来能成为西北回教徒领导人的唯一将领”；关于马步青，“具体不详”；关于马仲英，“目前客居苏联……行动不详”。²

虽然日本人对“回教徒军阀”的评价不高，但仍认为他们有利价值。例如，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高信六郎曾向广田外相做出过这种说明：“如果驯服了青海的马步芳，切断从哈密经兰州至西安的通道，并因此切断‘苏’联邦向汉口政府提供武器的道路，就掐住了汉口政府的命门。这件事不仅可以加快事变的解决，也可以阻止赤化势力依托这个通道东进，是一个十分切合实际的措施。”³回教圈考究所编撰的《回教圈史要》一书，对于“五马”的影响力做了如下断言：“很明显，居住在支那西北角受马姓军阀统治的回教徒，未必会倾听按照赤化音符吹奏出来的抗日笛声。其实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说他们对在马姓军阀的指挥下，采取独自行动充满了期望。”⁴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回教徒军阀”站在日本一边，与日本进行合作的话，战争局势就会变得对日本有利。

从当地日本领事馆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回教”团体积极地参与了对“五

¹ 中国回教华北联合会总部：《中国回教联合会第一年年报》，10页。

² 《西北地方ニ於ケル回教並一般情况等報告方ノ件》，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雜件/回教関係 第二卷3. 中国 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400。

³ 《青海馬步芳利用方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4類 労働及社会問題/各国ニ於ケル反共產主義運動関係雜件 第三卷3.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985200。

⁴ 回教圈考究所编：《回教圈史要》，293页。

马”的劝降工作：“该反共同盟对五马联盟的联络，原来由在包头的高桥水之助（内蒙古军最高军事顾问）专门负责，该员最近将盟长晁悉文从奉天迎进包头，在协商了推行此项工作的方法之后，（晁悉文——引者）已经于数日前由该地出发潜入宁夏方面。为了从当地通报其后的进展情况，一名同盟干部已于九日飞往包头”，“设在包头的‘穆斯林’同盟是该项工作的首脑总部，所需要的准备工作已悉数完成，首先进入五原，已经与当地秘密取得了联系。向马鸿宾（临河）、马义忠（陕西）派出了密使，同盟干部则从分散驻屯于五原周边的共产军的空隙中穿过，进入了临河”。¹

事实上，这些“回教徒军阀”们从前在购入军火的时候，就已经与日本军方有过接触。比如，1930年11月，“马鸿逵通过上海的德商汉文洋行，与大仓洋行签订了购入二千支日本三八式步枪的协议”，“还希望将来能购入机关枪、平射炮或曲射炮”。² 1936年12月马步芳、马步青通过驻扎在天津的日军，提出购买三八式步枪一千支、步枪子弹一百万发（马步芳）、三八式步枪一千支（含刺刀及各种附件，马步青）。日军对此前卖给这两人的兵器用途进行了调查，并认为“考虑到在与额济纳机关等保持联系问题上，可以利用他们”，因此同意将武器卖给他们。³ 此外，1937年5月21日，马步芳通过日本的支那驻屯军购入了军刀2000把。⁴

虽然统称“五马”，但其中势力最强的是马步芳和马鸿逵。他们在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骑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1937年6月在蒋介石的严命之下，马步芳下令袭击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但他却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活动的“额济纳机关”，也就是日军设在尚未被占领的宁夏省额济纳旗的特务机关，逮捕了“江崎寿夫为首”的日本人特务机关员11人，其中10人“于10月11日在兰州被枪毙”。⁵剩下的一名“关东军间谍大迫武夫”，由于得到马步芳军第一旅旅长马步康的力保，说他是自己的知己，一个蒙古人而已，得到释放。其后，大迫武夫又一次进入青海，“活跃在西宁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活动。⁶

但是，根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高信六郎于1938年3月25日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的报告——《关于新疆及青海情况并马步芳对日态度的问题》，就在“额济纳机关”事件的翌年，马步芳放出想在印度孟买与日本方面进行协商的风声，并就前一年袭击“额济纳机关”、枪杀日本谍报员之事对日方进行了如下说明：“那是误中支那政府的奸计，而我本人对日本并没有任何敌意”，并且说明自己有在日本的援助和指导下反抗国民政府，驱逐赤化势力的决心，如果日军进军甘肃的话，“将立即将枪口对准汉口”，希望获得日本的理解。⁷

在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中，有一种“回教徒”先天地“极端厌恶共产主义，具有亲日感情”

¹ 《第五九号ノ一 至急 極秘》，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雜件 第三卷 1 4. 滿州国（1）一般及雜。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43400。

² 《兵器拂下ニ関スル件》，昭和六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昭和06年《密大日記》第1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C01003951700，文件名为《兵器払い下げに關する件》。

³ 《馬步青馬步芳ニ対スル兵器壳渡ノ件》，昭和十二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昭和十二年《密大日記》第7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C01004340900，文件名为《馬步青馬步芳ニ對する兵器壳渡の件》。

⁴ 《支那ニ兵器賣却ノ件》，昭和十二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昭和十二年《密大日記》第8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C01004346900，文件名为《支那に兵器壳却の件》。

⁵ 《額濟納特務機關員ノ情況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滿機密・密・普大日記/陸滿密大日記/昭和十三年/昭和十三年《滿受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C01003367400，文件名为《額濟納特務機關員の情況に關する件》。

⁶ 《額濟納特務機關員の情況ニ關する件》，昭和十三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滿機密・密・普大日記/陸滿密大日記/陸滿密大日記/昭和十三年/昭和十三年《滿受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C01003367400。

⁷ 《新疆及青海事情並馬步芳ノ對日態度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雜件 / 回教關係 第二卷 3. 中国 分割 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400。

的说法。所以，他们认为，可以利用马步芳“阻挡经由新疆东渐的赤化势力”，“切断由哈密经兰州到西安的、苏联供给汉口政府武器的通道”；¹“马鸿逵历来对日本抱有好感”。1938年5月16日，“驻蒙兵团参谋长”在向大本营参谋次长和外务省次官拍发的秘密电报中，传达了马鸿逵对日本的如下希望：“马鸿逵来信提出，每有关于回教工作（在京津地区）的新闻报道，就会刺激支那方面，增加他们对回教徒首脑阶层的戒心，也就更加加深对他们的压迫。因此应该绝对控制报纸报道。他的这一意见今后值得考虑”。²由此可见，其实马鸿逵也想与国民政府和日本两方面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根据一份“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可以得知，马麟于1938年11月派特使绕过中国军队防守线，从兰州跋涉一个月到达北京，向“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告了甘肃宁夏方面“回教军”的驻扎情况。马麟是马步芳的叔父，曾经担任过青海省省长，但在1935年的权力斗争中输给了马步芳，当时隐居在家乡甘肃省临夏。如果“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的这份报告属实的话，可以认为，马麟是想通过加强与日本军的关系重新夺回权力。

关于当时“五马”和“回教徒”团体的动向，日本人的评价有一定的出入。由大久保幸次担任所长的“回教圈考研究所”认为：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支那的回教徒在理解防共主义大局的同时，为了保卫他们的宗教信仰权和生活权利，积极参加圣战和兴亚大业，是十分自然的事”。³但是佐久间贞次郎则一直坚持否定意见，警告不可夸大事实：“世人最近通过报纸宣传等得以屡次看到和听到西北支那回教军将领五马，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麟、马仲英、马鸿逵等（名字——引者），由于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引者）以来，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也得到大力宣传，因而产生了应该与支那回教徒联合防共，而这项工作也正在进行的错觉。京津两地的回教的那个什么会，尽管实际内容空洞，有名无实，但是宣传却做得玄乎其玄，未免过于夸大其辞。”⁴

五、战争目的下的“回教工作”

战争期间，日本建立了几个与“回教”问题有关的组织。丽泽大学教授大久保幸次（1887-1947年）号称是日本最初的伊斯兰教研究者，但是从曾积极参与在日塔塔尔人的内部争斗一事中，让人可以感觉出他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1938年3月，大久保幸次接受了德川家族的资金援助，成立了回教圈考研究所（后改名为回教圈研究所）并一直担任所长。1938年5月考究所并入日本善邻协会系统，接受日本外务省的财政补贴，1938年7月开始出版月刊《回教圈》，并一直发行到1944年12月号。⁵

战争时期成立的另一个有关伊斯兰教的组织为“大日本回教协会”。该协会作为“调查和执行回教对策的专门机关”，⁶成立于1938年8月前后。值得注意的是，该协会的办公室人员中有五人为黑龙会成员，⁷协会的常务理事为“黑龙会”首领葛生能久。而协会的经费，除了一部分

¹ 《青海馬步芳利用方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4類 労働及社会問題/各国ニ於ケル反共產主義運動關係雜件 第三卷3 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985200。

² 《蒙情電第二九七号》，昭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3。中国 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400。

³ 回教圈考研究所编：《回教圈史要》，296页。

⁴ 佐久間貞次郎：《回教の動き》，東京：春日書房，1938年9月，230页。

⁵ 《補助金使途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七年九月十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33700。

⁶ 《本邦ニ於ケル最近ノ回教問題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33500。

⁷ 《大日本回教協會創立費會計報告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

募捐之外，基本是由外务省全额负担。1938年10月，协会向外务省提交了一份总计一千万日元的《十年经费预算》。¹ 并从第二年开始，每年按季度从外务省领取经费。² 大日本回教协会从一开始就分为总务部、事业部和调查部三个部门。调查部的主要任务为：“有关回教的调查和研究”，“调查回教圈各地方的事情——民族、语言、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等”。³ “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在1938年8月提交给外务省《关于建立回教对策》报告中，如此定位“大日本回教协会”：“将大日本回教协会看作是民间的最高回教调查机关，给予支援和指导，令其主要从文化的方面实施各种对回教徒政策。”⁴ 从这些工作内容和经费渠道上可以看出，“大日本回教协会”不过是一个执行日本国策的机关。

“大日本回教协会”所作的最大工作，就是1939年11月在东京举办了“回教圈展览会”，利用这个机会，还召开了“世界回教徒大会”。这次大会作出了“今后每年召开回教徒大会”，以及“第二次大会定于东京召开”的决议。但是第二年四月，因为找不到出席者和担心遭到有关各国的指责而不得不决定停办。⁵

在回教圈研究所和大日本回教协会等所谓民间“回教”机关的背后，是由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有关人员组成的“回教研究会”（又称“三省回教研究会”或“三省回教问题研究会”）和决定“对回教政策”的“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简称“回教问题委员会”）。将中国的“回教”作为主要渗透目标，是这两个组织活动的共同特征。

“回教研究会”逐月召开，有时甚至每月召开两次。⁶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研究会上发表报告的是今冈十一郎，他的报告内容大量涉及中国伊斯兰教。他强调：“随日支事变后的形势发展，因为今后我国将会实践从北支到内蒙，进而进入新疆，再进而进入中央亚细亚的大陆政策”，所以应该理解“回教”的重要意义。今冈尤其强调新疆的重要意义，为此使用了很大的篇幅。他说：

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 / 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33600。

¹ 《大日本回教協會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 / 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33600。

² 《大日本回教協會ニ対スル補助金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五年七月十日起案、七月十六日裁決，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 / 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33700。

³ 《大日本回教協會本部業務分担表》，昭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 / 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33600。

⁴ 《回教対策樹立ニ関スル件》和《本邦ニ於ケル最近ノ回教問題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八月，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 / 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33600。

⁵ 《世界回教徒大會開催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 / 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33700。

⁶ 研究会的报告内容，现在可知的有：《回教研究会，外務省歐亞局第一課今岡囑託報告》（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報告（續）歐亞一課今岡囑託》（昭和十二年十三日）（以上两件出处为：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 / 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33200）；昭和十三年一月十七日，外務省東亞局第一課中田通訳官：《回教研究会研究報告》；昭和十三年二月七日，外務省東亞局第三課牟田副領事官：《滿洲の回教》；昭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外務省東亞局第三課白坂囑託：《南洋回教徒ノ情勢》；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外務省調査部第三課田邊囑託《印度回教徒問題》；六月外務省調査部第三課，《伊太利ノ回教政策》（以上五件出处为：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 / 回教關係第二卷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33400）；昭和十三年四月軍令部第三部犬塚大佐《極東猶太財閥最近ノ動向ト之ガ対策ニ関スル研究》；（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 / 回教關係第二卷分割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 系統查詢編碼 B04012533500）。

“我认为新疆才是大亚细亚的心脏。所以有人说：‘统治了新疆就是统治了亚细亚’。”¹“日本被称为是亚细亚的盟主。日本真要成为亚细亚的盟主，就不能不尽早掌握这个亚细亚的中心地带、亚细亚的心脏。”如果掌握了这个地域，就可以“从背后牵制支那，穿透苏联的脆弱部分的东部西伯利亚及中央亚细亚的腹部，从大英帝国的中心即印度的背后进行牵制，摧毁被英印号称为防卫线上最后的金城汤池、即新加坡军港的防卫力量”，这是一个“可以一箭三鸟（英、俄、支）、非常有效的目标”。²

根据“回教研究会”的“研究成果”，1938年4月23日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就成立“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达成了一致意见。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为：“设立由外务当局负责的回教及犹太委员会，分析探讨该问题的根本对策，外、陆、海三省及各派出机关之间经常保持联系，在统一的方针下处理有关回教及犹太教的问题。”³规定担任外务省的东亚局长、欧亚局长、美洲局长、调查部长、陆军省的军务部长、参谋本部的第二部长、海军省的军务部长、军令部的第三部长等与外交和军事有着直接关系职务者，出任“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的干事。⁴

1938年8月，刚刚成立不久的“回教问题委员会”，在向内阁总理大臣及各大臣提交的《关于建立回教对策》中指出：“帝国的回教对策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回教徒最有力同情者的名分，以有益于对外经纶，尤其是帮助对英、对苏、对支国策的顺利实施”，在此基础上《关于建立回教对策》进一步指出：“（掌握——引者）回教徒的分布状况、人口及其特性，是帝国在对外经纶上必须大力重视的地方，而从现实来看，它还是建立处理支那边境问题根本对策的火烧眉毛的紧急要务。”⁵很明显，这个委员会之所以成立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支援侵略中国战争的考虑。

为了“回教工作”顺利进展，不致发生“歧视回教的误解”，1939年3月日本还出现了修改《宗教团体法》的呼声，要求将第一条改为“宗教团体为神道、回教、佛教及基督教”，即明确加入“回教”一词。据说是因为担心这样做反而造成歧视其他宗教的印象，这一运动才慢慢平息⁶。以上种种事实说明，“回教”问题在日本被完全政治化了。而日本政府之所以使出了种种手法，从政治、财政、人力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有关“回教”的活动，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将“回教”变为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工具。

1938年10月4日，驻蒙军司令部制定了一份绝密文件——《暂行回教工作要领》。其中规定的“回教工作”的第二个目标为：“促进以西北贸易为中心的经济工作以及加强与宁夏兰州方

¹ 《回教研究会、外務省欧亜局第一課今岡囑託報告》、《報告（續）欧亜一課今岡囑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十二月十三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一卷、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33200。

² 《回教研究会、外務省欧亜局第一課今岡囑託報告》、《報告（續）欧亜一課今岡囑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十二月十三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一卷、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33200。

³ 《回教（及猶太）問題委員會ノ設置及經過ノ件》，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3。该文件未注明时间，但是从本文内容及同卷其他文书上来看，应该是昭和十三年四至五月间的档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33600。

⁴ 《回教及猶太教問題委員會内規》，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3。该文件未注明时间，但是从本文内容及同卷其他文书上来看，应该是昭和十三年四至五月间的档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33600。

⁵ 《回教对策樹立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八月，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33600。

⁶ 《宗教团体法ニ関スル件》，昭和十四年四月一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分割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33600。

面的联系”，其目的除了通过贩卖日本商品构建对日本的经济依赖关系之外，还包括“利用回教徒在宁夏兰州方面实施谍报和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当前在包头实施的培养特别人员的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将培养出来的特别人员混入以上（指宁夏兰州方面——笔者）商队，以建立与宁夏兰州方面进行联络的机关”；“现在要在灵活使用有联络的密探、及建立和确保与其他特殊人物等进行直接或间接联络的手段上加大力度。”《暂行回教工作要领》规定的第三个目标为：“建立回教徒军”，“首先在蒙疆地区的回教徒中选拔胜任者，编成回教军（最初建立小规模部队作为实验），为将来实力雄厚的回教工作做准备。”为了能够实现这些目的，军部要提供“依托西北贸易商进行谍报及宣传工作的费用”、“培养和使用特别工作人员的费用”和“在军司令部、特务机关等机关中充实有关回教工作事务人员的费用”等“特别工作费”。¹

根据以上《暂行回教工作要领》，12月5日驻蒙军参谋部制定了《回教青年指导纲要》，其目的为“指导（回教青年——引者）为建立西北地区防共亲日蒙政权工作而努力献身”。²驻蒙军司令部在翌年5月制定的《关于对蒙疆重要政策思想统一的问题》中再次明确提出：“蒙疆的回教徒工作，在于支援西北回教徒完成以亲日、防共为精神的独立复兴。”³同一时期，总部设于张家口口的“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与总部设于厚和的“西北回教联合会”合并。⁴驻厚和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山崎信彦在提交给上级的报告中说道：“该总部的工作，首先是对蒙疆回民青年实施精神教育，使防共亲日开花结果，最终建立西北独立国。”⁵总之，由日本军方直接指挥的“回教工作”，其目的不仅仅为维持占领区秩序，而且谋求随着战争的扩大最后建立由回教徒组成的独立亲日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回教徒”和“回教工作”，向中国西北部扩展日本的势力范围，绝非是“驻蒙军”自己的想法。1937年1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参谋部第二部已经制定了一份“军事机密”文件——《关于支那进行长期抵抗的情势判断》，列举了数条“导致国民政府崩溃的方略”，其中包括：建立反共、反国民政府的政权；激化国民政府内部的矛盾；促使地方实力派抬头；煽动“反国民政府”的暴动和“对亲共容共分子进行‘恐怖’活动”；持续封锁海岸线；彻底轰炸中国的军事、政治、交通、经济设施等。其中第六条为：“致力于怀柔西部内蒙古及西北地区的回教徒，扶植亲日反共反国民政府势力，以阻止苏联经外蒙及新疆方面（向中国——引者）输送兵器和军需物资。”⁶

“日本国际协会”也在1938年4月提出的《对支时局对策》中，以“推进怀柔边境民族及回教徒工作”为第六项对策。⁷本文最初已经提到，1938年7月8日，在开战一周年之际“五相会议”制定了指导性纲领——“随时局发展的对支谋略”，提出了以“在让敌人丧失抵抗能力的

¹ 《文書返送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支機密・密・普大日記/《陸支密大日記 63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 C04120639500，文件名为《文書返納に関する件》。

² 《回教青年指導要綱》，昭和十三年，陸軍省大日記/陸支機密・密・普大日記/《陸支密大日記 73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 C04120707300。

³ 《蒙疆重要政策ニ対スル思想統一就テ》，昭和十四年五月三日，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 对支那国/支那事变關係一件 第十九卷 2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 B02030558900。

⁴ 《第七号、往電第六号ニ関シ》，昭和十四年一月十四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3。中国 分割 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400。

⁵ 《厚警高秘第二一四五号》，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3。中国 分割 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500。

⁶ 《六.支那ガ長期抵抗ニ入ル場合ノ情勢判断》，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 对支那国/支那事变關係一件 第十八卷 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 B02030548200。

⁷ 《四.重要国策關係（支那事变中）/十六）对支時局对策》，昭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 对支那国/支那事变關係一件 第四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 B02030524300。

同时颠覆支那现中央政府，或者让蒋介石下野”为目的的六项“纲领”。其中包括：通过起用中国一流人物来软化中国民众的抵抗意识，怀柔杂牌军以分化瓦解和削弱中国军队战斗力，利用实力派人物树立反蒋、反共、反抗日政府，制造法币暴跌（此点以后被否定）等。同时作为第四点纲领被提出的是：“推进回教工作，在（中国一引者）西北地方设立以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地带”¹。也就是说，从很早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军部就已经开始考虑通过内蒙古地区的“回教徒”，将其势力范围向西北部扩展。

中国的西北地区，在地理上与苏联接壤。因此，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日本军部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1935年12月2日，“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向陆军步兵少佐羽山喜郎发出一份绝密命令，将他的“负责谍报区域”设定为“绥远省、宁夏省、甘肃省、新疆省及蒙古”，同时又要求在绥远省的呼和浩特、察哈尔省的张家口、西索尼特、多伦和山西太原各地设立“特务机关”，并命令各“特务机关”：“准备并实施对蒙、对苏、对支的谍报工作，调查兵要地志（包括经济资源），收集并准备实施谋略所需要的资料。”²这份文件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实施谋略”所指何事，但明显意味着针对该地区的军事侵略行动。换言之，这份文件不仅可以证明日本军方至少在1935年底前已经具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而且可以证明日本军方已经将这些边疆地区列入其军事侵略对象地域当中。

日本之所以想到利用该地区的“回教徒”，一是因为他们认为“回教徒”因其宗教信仰，先天就是反共的；二是因为他们认为“回教徒”在西北地区具有特别强大的实力。例如，1938年5月“防共回教徒同盟”成立大会发出的宣言——《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宣言》，向西北的马姓军阀发出了如下呼吁：“位于支那边境西域的五马联盟应该与南方的土耳其遥相呼应，高举反共运动的烽火，切断苏联对支‘红色通道’，击破蒋介石容共政策的最后抗日据点。在此基础上，我等回教徒同志以神国日本为盟主，为了亚细亚文明的复兴，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结成‘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³

由于日本“回教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援侵略战争，根本没有想要真正保护广大“回教徒”的利益，因此大政翼赞会在于1943年4月提交给东条英机首相的《关于回教徒对策的调查报告书》中提出：“在我国，历来只有以回教工作为目的的、由各种国际社交团体和宣传机关进行活动，对外宣传中缺少一种能够从内心深处打动、振奋海外回教徒大众感情的东西。仅仅限于与一部分为政者之间搞好关系，反而会让更多的回教徒误以为（日本的回教团体——引者）是伪装的信仰团体，到了后来知道不过如此时则大失所望，这种前例已经不少。”⁴前面述及与“五马联盟”联手的设想，当属此类。

一直与中国“回教”有关系的佐久间贞次郎，也看出日本为了战争利用“回教”，反而危害了中国“回教徒”的利益：“日本所谓大陆政策，必须要以文化和人道主义为基础。不能再是像他们在十九世纪中所做的那样一直坚持霸道的政治主义……就像日支事变那样，完全是由于支那

¹ 《時局ニ伴う対支謀略》，昭和十三年七月八日，《五相會議決定》，外務省記録/A門 政治、外交/1類 帝國外交/1項 対支那国/支那事变關係一件 第十四卷 2 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2030540000。

² 《支那駐屯軍司令官訓令ノ件通達》，昭和十一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昭和十一年《密大日記》第1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C01004134100，文件名为《支那駐屯軍司令官訓令の件》。

³ 《第一八号ノ一（別電、部外極秘）》，昭和十三年五月九日，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 2。満州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300。

⁴ 《調査会報告書〈大東亜建設基本方策ノ具現並ニ之ニ対スル圈内諸民族ノ協力ヲ要スル事項及右確保方策（乙南方諸地域）〉上申ノ件》，昭和十八年五月十日，同《華僑対策》及同《回教徒対策》上申ノ件，内閣/公文雜纂・昭和十八年・第七卷・内閣七・内閣七（大政翼賛會關係二）。国立公文書館所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A04018704100，文件名为《調査会報告書〈大東亜建設基本方策ノ具現並ニ之ニ対スル圈内諸民族ノ協力ヲ要スル事項及右確保方策（乙南方諸地域）〉、同《華僑対策》及同《回教徒対策》上申ノ件…》。

一方的误解和错觉带来的恐日感，最后发展到排日、抗日，因思想倾向而想象为是一种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立。结果使得支那大陆的三千余万回教徒，尸横遍野、气息奄奄，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境地。”¹

说卢沟桥事变来自于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解，这当然是佐久间的一面之词。但他毕竟说出了一些事实真相：如果为侵略战争所利用，最后付出惨痛代价的，的确只能是“回教徒”自身。就像对外高喊着支持蒙古民族解放，私下里却千方百计阻止一样，² 日本在战争期间之所以关心中国的“回教徒”，只是为了帮助推进侵略战争，丝毫没有帮助“回教徒”的目的，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结语

1938年7月，日本前驻外特命全权公使笠间梶雄在日本外交协会第266次例会上发表了《时局与回教》的演讲，他根据自己作为日本代表在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埃及等国工作过的经验，针对当时日本国内的伊斯兰教热，就“回教工作”背后隐藏着的日本人以为自己才是伊斯兰教社会救星的想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大家都以为不仅是支那的回教徒，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回教徒都在仰仗着日本人，希望得到一些什么帮助。而事实上，这些民族并没有仰望东方，借助日本的力量恢复民族独立的想法。都说日本是东洋的盟主，（日本——引者）自己也确实有做盟主的心情，但是对方并没有请求（日本——引者）一定担任这一角色。关于这一点，如不清楚认识，将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之所以会成这样，完全是来自于日本人至今为止的傲慢。”³

其实，日本在中国的“回教工作”遇到了许多中国“回教徒”的抵制。但是为推进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发动宣传工具大肆鼓吹“回教工作”的成就，实是自欺欺人。例如，在“在北京茂川机关”的指导下为日本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就被宣传为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回教”团体。可事实上，在一位冷静的日本外交官眼里，那里不过是一片“门前罗雀的回教联合委员会”的景象。⁴

“回教工作”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帮助了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的关心究竟蒙蔽了多少“回教徒”，实在值得怀疑。然而，日本为什么会产生在侵略战争中利用“回教工作”的念头，却值得深思。毫无疑问，侵略者们曾经认为，如果能够制造一个“共同的回教空间”，就能够覆盖住中国“回教徒”的“国家意识”；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让“回教徒”们以为日本理解、同情并且会保护“回教”和“回教徒”，他们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跨越被侵略国家的门槛，并且达到占领或分裂中国的目的。但是，侵略者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广大伊斯兰教信众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向来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而他们自己在主动接触“回教”和“回教徒”时却明显地带着日本国家色彩和侵略目的，因此，真正信任日本的中国“回教徒”并没有几人，“回教工作”在进入1940年代以后也渐趋式微。尽管如此，受到刺激的中国国民政府，也不得不针对边疆民族和信仰伊斯兰教民族集团，发起了新一轮确认近代国家主权范围、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运动。⁵

¹ 佐久間貞次郎：《回教の動き》，東京：春日書房，1938年9月，85頁。

² 《對蒙政策要綱》，昭和十三年十月一日，外務省記錄/A門 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 對支那國/支那事變關係一件 第十八卷2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統查詢編碼B02030550400。

³ 《時局と回教》，昭和十三年十月，外務省記錄/A門 政治、外交/3類 宣傳/3項 啓発/本邦對內啓發關係雜件/講演關係/日本外交協會講演集 第五卷7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統查詢編碼B02030922100，文件名為《時局と回教(前特命全權公使、笠間梶雄)》。

⁴ 《濟南發閣下宛電報第五二號ニ関シ》，昭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外務省記錄/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會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會/各國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3。中國分割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統查詢編碼B04012550500。

⁵ 《白崇禧ノ日本軍西北工作妨害》，內閣/各種情報資料/各種情報資料/各種情報資料・支那事變ニ関スル各國新聞論調概要。JACAR系統查詢編碼A03024015400，國立公文書館所藏。該文件未註明時間，但是從本文內容及同卷前後排列其他文書上來看，應該是昭和十三年五月間的檔案——引者。該資料在JACAR系統上件名為《米國 白崇禧ノ日本軍西北工作妨害》。

【论 文】

20 世纪上半期日本的中国回教民族政策述论¹

曾凡云²

【摘要】 利用民族问题“肢解”中国，历来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贯政策。进入 20 世纪后，日本人“独具只眼”，看出了中国回教民族对于实现其“东亚政策”的重要性。因此日本各界不遗余力，纷纷起来调查研究中国回教民族，在国内和中国建立了各种“回教”团体组织，利用种种借口分化、拉拢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挑起民族矛盾，企图分裂中国，进而实现其征服中国的“东亚政策”。

【关键词】 日本；中国；回教民族；政策；述论

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其一贯手法就是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辅以政治手段，即扶植傀儡或挑拨民族矛盾，从而达到“以华制华”之目的。因此扶植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傀儡政权、挑拨中国各民族间矛盾便成为实现其“东亚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的运动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占领区的统治以及抵抗汉民族主义的斗争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³ 在中国，由于回教民族⁴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所处地理位置又极其重要，而国民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又导致回汉两族之间矛盾不断，隔阂严重，这就使近代以来致力于“扬国威于四海，拓波涛于万里”的日本看出了“制定恰当的回教政策对于日本的东亚政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⁵ 为此，日本政府和民间都不遗余力，在中国“回教”问题上下了功夫。关于 20 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回教民族政策的研究，学术界有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以王柯和安腾润一郎为代表⁶。他们主要依据日文档案资料为依据进行讨论，对中国大陆当时出版的伪回教组织出版的刊物很少利用，鉴于此，本文将把中文资料与日文资料结合起来对此再做一番探讨。

一、20 世纪上半期的日本对外“国策”与中国回教民族

明治维新后，随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对外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此后，日本政府的对外“国策”就是把明治天皇揭橥的“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总战略一步步付诸实施。进入 20 世纪后，日本在其“功利主义的亚洲外交战略”⁷指引下，开始把“经略大陆”这一“国策”付诸实施。为早日实现吞并中国，把“大陆政策”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宏愿”，日本一方面以武力为后盾，不断寻找借口，借以挑起战争，进而占领中国；另一方面则妄想以政治手段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即利用民族分化之方式，使各个民族分别独立，脱离中央政权，任其宰割，以实现其“经略大陆”这一重要“国策”。

¹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104-114 页。文中黑体字为本《通讯》编者所加。

²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0 级博士生。

³ [日]安腾润一郎，“Japan's ‘Hui-Muslim Campaigns’ in China from the 1910's to 1945”，《日本中东学会年报》2003，(18-2): 21.

⁴ 本文所谓的回教民族，是指当时日本对于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称谓，在当时日本各种文献以及中国出版物中，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经常称呼为“回教”，有时也称为“回族”，所以本文题目沿用“回教”来指代伊斯兰教（穆斯林）；而下文中的“回教徒”是指日本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士的称呼。

⁵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 2.

⁶ 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87-105 页。

⁷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17.

早在明治末年，日本民间部分人士就对中国回教民族产生了“浓厚兴趣”¹。然而这种“兴趣”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宗教信仰，完全是出于官方目的，即实现其“国策”的要求²。进入20世纪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开始行动起来，积极鼓吹要以中国“回教”为中心制定对华政策，即要求日本应该“树立回教政策为重要国策之一”。对此，日本矶谷廉介少将在谈及回教、回教徒、回教国家的回教民族以及宗教问题时，毫不掩饰地声称：“应从政治与宗教两方面加以观察，日本既欲为东亚之盟主，则对于树立回教政策为重要国策之一，殆无疑议”³。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少将对此也表现出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以近东与南洋为中心之回教问题，对于日本之南进政策，应成为极重要考虑之议题，并应有以解决之。”⁴

在政府方面，陆相荒木贞夫认为，日本应以“确立根本的东亚政策为当前急务，其中树立恰当的回教政策又特别急切”。鉴于“回教徒”问题对于日本具有特殊性，他主张“通过拨发经费与扩大预算等方面着手支持从事回教政策之人士。”⁵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回教”运动，日本内阁于1936年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策略的议案》。该《议案》指出，鉴于中国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因此要**加紧“对边境的调查（如对四川、甘肃、新疆、青海等派遣资源调查队等等），借以实施分裂政策”**⁶。七七事变后，为了加快分化回教民族、灭亡中国的步伐，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周年之际，日本五相会议又作出了关于《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的决定，其纲要要点之一就是“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⁷

总之，就日本利用中国“回教”阴谋来看，日本早已发现了中国回教民族的力量，因为无论它们所谓“东亚政策”“西进政策”还是“亚洲门罗主义”“大亚细亚主义”，都必要作一番联络“回教”的功夫，而“回教民族，素以东亚之西北角为根据地，其为事实所难磨灭之优点。旧政当权，对此非但加以藐视，且而时加以摧残。”⁸因此，当处心积虑对外侵略之日本认识到中国回教民族对于其实现“大陆政策”的重要性后，国内各界便着手组织各种团体、研究会，对中国回教民族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以服务于其对外侵略之国策。

二、调查研究中国回教民族，希图为其“国策”服务

在日本民间，着眼于中国回教民族问题者众多，“其中尤以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及浪人会首领头山满为最著。”而对中国回教民族调查最为活跃的当属黑龙会的川村狂堂、涛秀成及浪人会的佐久间贞，他们三人在中国多年从事回教民族调查研究，有的长达三十余年；有的创办杂志，“倡导回民应以取得政权为前提，以权利为急务，以政府为攻击之目标”的蛊惑性宣传；有的鼓励回族同胞组织“大回回国”，阴谋肢解中国。⁹

¹ 据记载：明治33年（1900），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与浪人会首领头山满共同策划于东京，派黑龙会川村狂堂由大连来华，经东三省到北平（在北平加入回教），经察、绥到内蒙，再由河套到新疆，返西安后，又到青海，再经河州（临夏）到兰州、西安，经汉中到成都、西康、云南，返回重庆后，经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最后到达广东。历时三十余年，几乎游遍全中国，调查中国回教，研究中国回教种种问题。（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页）。

² 自称穆斯林人的日本学者若林半，一语道破了日本各界对中国回族产生“浓厚兴趣”的实质。他说：“日本的回教政策，是皇家经略亚细亚的根干，于膨胀日本的发展上，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有着不便明言的重要性”。（肖鲁，“日本对东方道德宗教的扒手行为”，《新华日报》1942-05-26（4））

³ 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5-6页。

⁴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13年，4。

⁵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13年，4。

⁶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8. 日中战争1》，东京：みすず书房，1965年，367。

⁷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389~390。

⁸ 西北回教联合会会报编辑室编，《西北回教联合会一周年纪念号》（出版地不详），西北回教联合会本部，1940.15。

⁹ 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3页。

对中国回教民族地调查研究，日本政府及军部从一开始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日本对于“回教”地关注，原本就与他侵略亚洲的目的有关。¹ 明治 38 年（1905）5 月，樱井好孝接受外务省的秘密命令，前往新疆至蒙古一带地方进行旅行和视察，于次年 12 月返回日本，“行程约二万余千清里”。他在向外务省提交的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内蒙和新疆的地理位置，行政、交通状况，人种、居民成分，宗教信仰和商业物产以及气候等。² 1910 年，日本外务省调查员中久喜信周，对河南省的“回教徒”也进行了详细调查。³ 此外，在大正三年（1914），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若林九满也被派到中国湖南游历，要求他以湖南为中心广泛结交中国回教徒，鼓动中国回教徒活跃起来，以作为制定日后对中国政策的“资本”。⁴

而一向积极推行侵华政策的关东军自然也不甘示弱，1935 年 7 月 25 日，关东军参谋部提出《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各民族的目的，其中特别规定“为了笼络回教徒，要仔细了解其风俗习惯，首先取得他们的好感，再给以必要的援助，终于促进满蒙回教徒的团结，努力设法利用集体力量。”⁵ 并于 1936 年 5 月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上，详细确定了《西北施策要领》，确定了利用回教民族分裂中国的阴谋。

日本参谋本部，对于我国西北情况也甚为注意，不断派出间谍公开或秘密前往回族集中聚居的西北地区进行调查。据《华北日报》报道，1934 年“四月期间共派四次，计一月派白田中佐、远藤主计，二月派谷萩，三月派川本少佐，四月派柴山、坂庭、西村。以上人员均领有公安局护照，其未领护照赴西北调查者甚多。”⁶

同时，一些著名的日本“支那回教”问题研究专家也在日本政府或军方资助下来到中国，“不辞辛苦”的奔赴中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回教民族问题。1935 年 9 月，著名“中国回教”问题研究者若林半在其弟子陪同下，花费两个多月，游历了中国中、东部地区的绝大部分的大、中城市，详细“调查中国的回族政策及状况，并与之进行联络”。然而此次“美其名曰”的调查及旅行费用却是来自外务省出的“补助费（500 元）”。⁷

在调查结束后，若林半详细阐述了日本与中国回教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现在日本、满洲国有百四五十万回教徒，中国有七千万回教徒，回教徒居住在一起，结成一大集团。制定中国的政策与对回教徒的政策之间具有奇妙之处，因为这是真正认识中国的证据。”⁸ 所以，他认为正确认识回教世界和制定恰当的回教政策，这对于日本“国策”来说是一件紧急重要的事情。因此他强烈要求“政府从速制定具体的对华回教政策，并要热心且忠诚的实行”，而且要“国民意志坚定，信心百倍，甚至认为为此付出生命也是理所当然的”。⁹ 与此同时，伪满洲国侍卫官长工藤忠君也以民间人士的身份曾在中国各地“长途跋涉”，精密调查研究“中国回教”，并成为了研究“中国回教”的权威者。他认为关于“中国回教”政策的研究要急切进行，不能怠慢，因为这是“事关国家的百年大计，应当不断努力推进。”¹⁰

可见，日本各界对中国回族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不仅具有“雷同性”，而且具有“煽动性”，

¹ [日]白杵陽，《殖民地政策学から地域研究へ》，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5）：第 89 页。

² [日]樱井好孝，《蒙古视察复命书》，明治四十年一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http://www.jacar.go.jp/chinese/center/center.html>）电子版，查询编码 B03050331800。

³ 中久喜信周调查，《河南的回教徒》，明治 43 年 10 月，[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 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 B02130561900，B02130562000。

⁴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1。

⁵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 8. 日中战争 1》，东京：みすず书房，1965，494。

⁶ “参谋本部派员调查我西北”，《华北日报》1934-05-11(2)。

⁷ 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90 页。

⁸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41。

⁹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2。

¹⁰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52。

其对中国回教民族的关注“原本就与侵略亚洲的目的有关。”因此，在日本各方看来，从事“回教”运动不单于宗教运动上有重大意义，举凡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外交上都有密切关系，因为“回教”从根本上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个分裂因素，值得日本积极加以利用”。¹

三、建立各种“回教”研究团体与组织，研究、分化中国回教民族

鉴于中国“回教”问题与日本国策息息相关。因此在日本国内，首先是一些学者、半官方人士成立了“回教圈考研究所”及“大日本回教协会”等“回教”研究团体，对“回教”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与宣传。

日本本来并无回教民族，它的宗教是大和教。但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日本全国上下却盛行着“回教”热。为系统研究“回教”，1938年4月，日本学界“回教”研究专家大久保辛次、小林元、松田寿男等在国内组织了旨在研究世界回教的“回教圈考研究所”（后改称“回教圈研究所”），并发行月刊《回教圈》。该研究所主要任务就是收集世界各国“回教”资料并进行研究，尤其对中国回教民族现状、国民政府对回教民族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9月19日，以陆军大将林銑十郎为代表的陆军将领和黑龙会等右翼势力成立了半官方性质的伊斯兰教政策研究中心——“大日本回教协会”，出席该会开幕式的有林銑十郎、川岛义之两大将及小笠原长生子爵等官界财界人士200余名，近卫首相、贵众两议院议长皆送来祝词²。作为“调查和执行回教对策的专门机关”，该“协会”创办《回教世界》刊物对各国“回教”进行系统研究，其宗旨是融合“回教”诸国，为其军国主义所用。1939年11月“大日本回教协会”主持“回教圈展览会”时，又借机举办“世界回教徒大会”，以宗教感情联络世界回民。

除了部分学者及半官方人士组织的“回教圈考研究所”及“大日本回教协会”等回教研究机关外，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外务省、陆军省以及海军省相关人员亲自组成的“回教研究会”（又称“三省回教研究会”）和“回教及犹太教问题委员会”，这两个“回教机关”的共同特点就是以“中国回教”为主要研究目标。

由于“回教研究会”与“回教及犹太教问题委员会”所具有的特殊军方背景，因而对于利用中国“回教”问题来服务于中日战争大局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在这两个“回教机关”召开的历次会议上，报告内容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回教”的。今冈十一郎在“回教研究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一语中的，强调指出了中国“回教”在与日本“国策”上的关系。他指出：“随着日支事变后形势的发展，今后我国将会实现从北支到内蒙，进入新疆，进而再进入中央亚细亚的大陆政策”，所以应该充分理解“回教”的重要意义。³而“回教及犹太教问题委员会”在1938年8月向内阁总理大臣提交的《关于树立回教对策的报告》中也再次强调中国“回教”问题对于中日战争的重要性。该《报告》强调指出，“与分布在亚细亚大陆回教徒建立友好亲善关系，足以确保从背后对支那进行牵制”；同时该“问题委员会”更是毫不隐瞒日本对“回教”的根本目的，即“在于获得回教徒最有力同情者的名分，以有益于对外经纶，尤其是帮助对英、对苏、对支那国策的顺利实施”；而“从现实来看，它还是建立处理支那边境问题根本对策的火烧眉毛的

¹ 1922年8月，大林一之（军方委托进行研究人员）在其所著的《支那的回教问题》中就其研究中国回族的目的写到：我认为，富于煽动性，并具有雷同性，在特殊地域里成为特殊潜在势力的支那回教，在现今的形势下就是支那的癌症。但是，除非到了支那自身被解剖手术切开之时，是无法将其剔除的。而因其病情发展缓慢，若没有来自外部的冲击就不会发生急激的病变。……因而，支那的回教，根据对它如何进行利用，可以使其在调整整个远东问题上发挥出一种有力的作用。（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5):89.)

² [日]回教考研究所编，《回教圈月刊》第一卷四号，东京：四海书房，昭和十三年十月，40。

³ 《回教研究会、外务省欧亚局第一课今冈囑託报告》，昭和12年12月6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 B04012533200。

紧急要务。”¹可见，这些“研究会”“委员会”就是日本“肢解”中国的重要宣传舆论机关。

此外，日本还在国内组织人员翻译古兰经，并大批印赠；开办经堂学习，招收中国回族学生，截止到1933年4月，就从中国招生了250余名回民留学日本²。1938年5月，日本在东京建筑一**政治性清真寺——东京清真寺**。在其落成典礼时节，便盛大招待世界回教代表，特别邀请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哥哥溥光夫妇“作为回教的坚定信仰者”，去东京代表“满洲国回教徒出席了东京回教礼拜堂的开堂仪式”³。一时间，“日本之与回教，回教之在日本，俨然呈现东方回教民族复兴迈进的中心势态。”⁴

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也大肆策划成立各种“回教”组织，挑拨回汉民族矛盾，企图分裂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扶植满族废帝溥仪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政权，开启了利用中国少数民族分裂中国的先声。对于人口众多，占据重要地理位置且又与中亚、西亚各国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中国回教民族，日本“用心之笃，爱护之热，希望之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扶植、拉拢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成立各种“回教”组织一时风起云涌。1934年2月17日，在日本顾问提议下，伪满洲国在首都新京成立了“伊斯兰协会”，这是日本在中国策划成立的第一个“回教”组织。“协会”成立后，由日人川村狂堂主持、管理满洲回教徒，他到处鼓吹“以回教为国家之重要分子，不特能为满洲健全之国民，抑且能为世界和平之领导”⁵，煽动回教民族独立建国以割裂中国。7月3日，日本关东军策划组织成立了囊括全东北的“满洲伊斯兰教协会”，在其成立一周年之际时，在东北已有10个办事处，166个分会。⁶1936年11月，日本将“满洲伊斯兰教协会”改为“满洲回教协会”以利于其宣传。平津沦陷后，日本于1937年8月在天津策划组织“天津回教会”，10月24日又在北平策划组织“北京回教会”。为了加强各回教组织的联络，1938年2月7日，日本又策划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大会”，日本陆军特务部部长喜多诚一少将以及大使馆森岛参事参加，该联合会“最高指导者”是北京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大会决定组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于华北、西北、内蒙古、华中、河南、西南等地各设联合总部。在华北联合总部下，于北京、天津、济南、太原、张家口、包头设置区本部。⁷“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宗旨为“提倡东亚精神、积极进行防共”⁸。该“联合会”还于4月9日决定设立“回教青年训练所”，加强对回教民族青年的统治。在日本支持下，该“联合会”迅速扩张，仅仅一年时间，就成为一个拥有389各分会的庞大组织。⁹

此外，1938年11月，日本在张家口张罗成立“西北回教联合会”。在包头、广州、张家口、承德等地相继组织了“蒙疆回教联合会”“广州回教协会”“中国回教青年团”“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防共回教徒同盟”等等“回教”组织。在教育方面，日本通过改组“西北学院”，创设“实践女中”等方式拉拢回教民族同胞实现“回民在建设东亚新秩序中的义务”。¹⁰总之，这些“回教”组织共同的宗旨就是：加强“防共阵线”，打倒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拥护“友邦仗义兴师”，实现“中日共存共荣”。

¹ 《关于树立回教对策》，昭和13年8月，外务省记录，[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B04012533600。

² “日本野心”，《京报》，1933-04-4(2)。

³ [日]大日本回教协会调查部编，《回教要览》，东京：天一出版社，1943.48-49。

⁴ 唐震宇，“东亚新秩序与回教徒之自觉”，《回教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40-03.7。

⁵ “伊斯兰协会已批准成立矣”，《盛京时报》1934-02-18(3)。

⁶ 回教圈考究所编，《回教圈史要》，东京：四海书房，1940(1):300。

⁷ “中国回教联合会宣言打倒共产主义”，《盛京时报》1938-02-08号外(1)。

⁸ [日]回教圈考究所编，《回教圈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东京：四海书房，昭和14(1).9。

⁹ 中国回教华北联合会总部，《中国回教联合会第一年年报》，第93页。

¹⁰ 唐震宇，“东亚新秩序与回教徒之自觉”，《回教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40-03.2。

四、网罗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反苏”“反共”“反蒋”，妄想“共存共荣”

中国西北地区，在地理上与苏联接壤，是路陆连接中亚、西亚及苏联的重要通道，因此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可以说无论由国际上还是国内上来观察，实为决定东亚和平之关键。因此，通过“回教徒”和“回教工作”，向中国西北地区扩张，对于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十分重要。所以，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大本营陆军参谋部第二部就已经制定了一份《关于支那进行长期抵抗的情势判断》的军事机密文件。在文件中列举了很多条可以促使国民政府崩溃的策略，其中第六条为：“致力于怀柔西部内蒙古及西北地区的回教徒，扶植亲日反共反国民政府的势力，以阻止苏联经外蒙及新疆方面输送兵器和军需物资。”¹[33]而“日本国际协会”也提出了类似的对于时局的对策²。因此，日本各界打着“共存共荣”的幌子，积极进行网罗、拉拢个别回族分裂分子的各种活动。

首先，日本各界打出“反苏”“反共”“反蒋”的口号，借以拉拢“西北五马”³为其所用。在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内有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回教徒”因其宗教信仰与汉族不同，因此“先天就是反共的”，而具有亲日感情。同时，日本认为具有强大实力的回教民族军阀，即“西北五马”与国民政府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易于拉拢。⁴为进一步分化拉拢马姓军阀，日本于1938年5月7日成立了“防共回教徒同盟”团体。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宣言》中向“西北五马”呼吁：“位于支那边境西域的五马联盟应该与南方的土耳其遥相呼应，高举反共运动的烽火，切断苏联对支那的红色通道，击破蒋介石容共政策的最后抗日据点。在此基础上，我等回教徒同志以神国日本为盟主，为了亚细亚文明的复兴，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结成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⁵

鉴于“西北五马”对于日本的“国策”具有如此重大意义，因此加强对“西北五马”的拉拢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日本打着“回人治回主义”，软硬兼施，拉拢一些阿訇、教长等，要他们呼吁“‘西北五马’在友邦日本协力之下，建设西北回疆乐土。即以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为范围，以全体回民为基础，以其部下为中心势力，拥戴一有利首领，建立一回族新式政权，而为东亚防共之一环。”⁶另一方面，重点拉拢掌握宁夏、青海命运的马鸿逵、马步芳。因为宁夏、青海地处北接蒙疆，东南与甘肃、陕西连接，前面是黄河，背靠贺兰山，地处西北交通要地。对于日本的“西进政策”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对此，日本驻沪总领事日高信六郎在向广田弘毅外相上报的电文中指出：“如果驯服了青海的马步芳，切断从哈密经兰州至西安的通道，就因此切断了苏联向汉口政府提供武器的道路，就等于掐住了汉口政府的命门。这件事不仅可以加快事变的解决，而且也可以阻止赤化势力依托这个通道东进，因此是一个十分切合

¹ 《关于支那进行长期抵抗的情势判断》，昭和12年11月23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REEL NO.A-0221. JACAR 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 B02030548200.

² 1938年4月，“日本国际协会”提出了《对支时局对策》，其中第六项对策就是“推进怀柔边境民族及回教徒工作”。（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5）：103.）

³ 所谓“西北五马”，此处是指盘踞在中国陕西西部、甘肃、宁夏、青海及新疆一带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仲英。他们都是回族且拥有军事实力的人物，他们支配着中国西北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大权，是决定中国西北命运的主要人物。因此，他们受到了日本的密切关注，对“西北五马”的起因，变迁、现在的动向以及国民政府对“五马”的联络工作都进行及积极地研究，妄图分化“五马联盟”及国民政府与“五马”的关系。（[日]外务省调查部编，《回教事情》第一卷第一号，昭和13年5月23日. 14-24.）

⁴ 日本回教圈考究所编的《回教圈史要》中，对于“西北五马”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就认为，“很明显，居住在支那西北角受马姓军阀统治的回教徒，未必会倾听按照赤化音符吹奏出来的抗日笛声。”（回教圈考究所编，《回教圈史要》，东京：四海书房，1940，293.）

⁵ 《第一八号（别电、部外极密）》，昭和13年5月9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 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 B04012550300.

⁶ 张洪涛，“西北于防共上之重要性”，《回教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9-06.14.

实际的措施。”¹

对此，广田外务大臣也认为应对于支那事变直接产物的“西北回教圈”，即“五马联盟”的动向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应该“利用宗教目的”来巩固“五马联盟”，使其从事“防共”“反蒋运动”。²而在日本的蛊惑宣传下，马鸿逵在其控制的“宁夏省回教协会”的会议上，每次报告的主旨皆是“防共”，在其制定的宣传口号上也每次都有“共产党是回教的敌人”标语，煽动回教群众仇恨共产党。³而一些受其迷惑的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也积极宣扬“反共”“反蒋”、响应与日本“紧密提携”、“共存共荣”等言论⁴。民族分裂分子张洪涛便是追随日本叫嚣的代表人物，他在《回教月刊》上发表了大量反动文章“大声疾呼”要联合“五马”势力，进行“反共”“反蒋”。他指出：“现欲求中共赤化势力根绝，则非捣其巢穴，断其联络不为功。西北既存有五马势力，且俱为反共之有力者，如能以宗教之关系，促其联合，加强‘回族势力地带’，而为铲共之中坚。盖如斯匪但阻断苏俄势力之前进，并可包剿中共于陕北一带。中共既除，‘赤色路线’塞而不通，则蒋介石政权定随此崩溃。如是，西北即可明朗，而东亚之和平不难以实现也。”⁵

其次，网罗、扶植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组织各种“回教”团体，充当其“防共”工具。据当时日本人实地调查，当时回教民族人口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显然是一大势力，而且“回教徒”具有很强的团结力，因此事实上成为左右中国的重要“潜势力”。从中国的西北边境到西南边境都与世界回教的中枢相连，因此应该进行仔细观察和研究。在中国，“回教徒”主要分布的西北边疆，即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因此“回教徒”应成为“防共”的坚强壁垒。⁶荒木文相在众议院会上对如何利用“回教”进行反共问题也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对于回教问题，回教信徒，数及数亿，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且其信徒在东洋特多，概努力于反共产主义，此为吾人深为关心之处”⁷因此，对于“目前积极防共上实居极为重要之地位”的回教徒上层分子极尽扶植、拉拢、分化之能事。

第三，日本在中国大肆宣传“回教民族”或推动“泛回教运动”，煽动回族积极“反共”，妄想利用回族结成一条“防共阵线”。所以，一方面，日寇在中国各地到处宣传“共产党是反对宗教的，我们回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亦在被共产主义反对之列，所以我们亦要反对共产主义”⁸。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成立的各种“回教”组织，发行报纸、杂志进行宣传⁹。在“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会章中明确规定：该“总联合会”“对外主张中日满三国紧密提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¹⁰。在“西北回教联合会”工作要旨中也有类似地规定¹¹。而且，为谋“日回亲善”，日本费尽心

¹ 《关于利用青海马步芳的密件》，昭和13年3月25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B04012985200。

² 《本官发满苑电报第二十三号》，昭和13年5月9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B04012550300。

³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宁夏三马》，北京：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00页。

⁴ 如日寇回奸刊物《回教》所载言论：“防共就是回教徒的使命。若实行防共，我回教民族须与日本紧密提携，共同图谋民族之发展，向堂堂正正的路上迈进。趁此时机，我回教民族团结一致，与友邦日本成一个生死线，庶乎东亚安定而礼教不亡也。……青年啊！赶紧觉醒吧！现在我们回教的复兴，是受友邦提携，将灭宗教的共产党替我们膺惩了，所以，信赖友邦保护，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等等（《回教》.4.）

⁵ 张洪涛，“西北于防共上之重要性”，《回教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9-06.12.

⁶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13年.51.

⁷ [日]《回教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9(7): 45.

⁸ 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第131页。

⁹ 据初步统计，日本利用“伪回教”组织创办的杂志有《回教》（后改为《回教周报》）《回光月刊》《醒狮报》《伊斯兰旬刊》《回教》《西北钟声》《回教月刊》等等数十种之多。这些刊物中的文章都鼓吹“中日共存共荣”“反共防共”。仅据《回教》月刊第一、二卷共十一期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反共防共”和为日寇侵略出谋划策的文章就达到75篇之多。（彭年，“日寇控制下的伪‘回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300页）

¹⁰ [日]外务省调查部编，《回教事情》第一卷第一号，昭和13-05-23.96.

¹¹ 1938年11月，日本在张家口张罗成立了“西北回教联合会”。该会工作要旨：（1）率领西北全体回教民众，

机召集中国各地“回教”组织的上层代表人物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世界回教徒大会第一次会议暨回教圈展览会。在日本顾问的帮助下，华北各地“回教”组织首脑及太原的教育家，西北的实业家共 12 位组团参加。为了显示对他们的尊重，在日本，他们被特意安排参观了首相官邸、文部省、海军省、拓务省、外务省、陆军省、商工省等处。¹ 同时，为标榜重视回族和伊斯兰教，挑选个别回族分子出任地方官。日军占领包头后，为实现其“西进政策”，特意挑选回族人金朝文担任包头市长，回族商人杨立堂为包头回教公会会长，不久又启用回族人蒋文焕担任西北保墙督办公署督办。此外也重用了韩梅亭之类的阿訇，以此笼络回教民族人心。²

第四，故意夸大回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挑拨回汉关系。日本利用历史上回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生活习惯风俗的不同，挑拨个人私争，离间民族感情，大肆宣传“回回并不是中国人”³“抗战是为了汉人”“抗战是为了蒋委员长”“援助回民自治”⁴等口号，企图鼓动回族群众脱离国民政府，组织所谓“回回国”，以遂其私图。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又到处挑拨回汉两族之间的关系，对于回教同胞“施以诱惑离间藉以分化我抗战的力量与坚固统一的局面，以遂其‘以华制华’的野心”⁵。因此到处宣传“抗战是为了汉人”，而日本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实现回族的“自觉独立”；还利用回民信仰宗教的心理，打出了“尊崇回教”、“维护回教”、“提倡回教”的幌子，欺骗迷惑回教同胞，以此分裂回汉两民族之团结。⁶ 同时，鉴于当时国民政府否认各民族平等，而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日本外务省则积极利用国民政府这一错误的民族政策，不遗余力地在其创办的《回教事情》杂志上大肆宣扬中国回汉两族仇视事件⁷。这种宣传就导致了个别不明事理的回教民族分裂分子利用日本的“防共”“反蒋”等政策，在回教民族群众间进行破坏抗日、投降日本的阴谋活动，给中国抗战造成了严重消极影响。

* * * * *

20 世纪上半期，中日两国处于严重对立时期。尤其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期间，可以说中日两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在这段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始终把回教民族当做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宗族，把回教民族问题当做宗族问题对待，采取“采取大汉族主义”的同化政策，这就为日本利用回汉民族问题分化中国提供了契机。鉴于“‘回回穆斯林’是一个能帮助日本联系中国北方和内陆亚洲地区的集团”⁸，因此，以“制定恰当的回教政策为着眼点来考虑东亚全局的重大任务”⁹成为日本各界的共识。所以在 20 世纪上半期，日本各界为顺利实现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这一“国策”，便采取各种手段拉拢、分化回教同胞，挑起回汉民族矛盾，这就给

并联合世界教胞，使各大民族永远协和，与日本帝国及防共诸国，共维东亚和平。(2) 发扬回教固有文化道德，励行普及教育，使青年得到正确思想。(3) 与防共国家，及各大民族共同携手，勇往防共阵线，一起灭此朝食，而维回教安全。(西北回教联合会会报编辑室编，《西北回教联合会一周年纪念号》(出版地不详)，西北回教联合会 1940, 1.)

¹ 丹子万，“日本回教展览会参加经过感想”，《回教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40-03-20。

² 吴懋功、王质武，“日军占领时期的包头回教人民 1937-1945”，包头市民族宗教志编修办公室、政协包头市东河区文史委员会合编，《包头回教史料》，无出版地址，1987-10-45。

³ 宁夏省政府教育厅，《宁夏回教教长战时教育问题讨论会专刊》第一集，宁夏省政府教育厅，1938-09。

⁴ 刘春，“日寇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新中华报》1939-07-28(2)。

⁵ 白崇禧，“动员回教精神”，《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一卷第五期 4。

⁶ 刘春，“日寇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新中华报》1939-07-28(2)。

⁷ 据日本调查，自民国 21 年（昭和 7 年）11 月至民国 24 年（昭和 10 年）6 月，在中国内地先后发生了“南华文艺侮教事件”、上海“北新书局侮教事件”、河南“归德县回汉互斗事件”等等共 13 起回汉两族仇视事件。（[日]外务省调查部编，《回教事情》第二卷第一号，昭和 14 年 2 月 20 日，9~12。）

⁸ [日]安腾润一郎，“Japan's 'Hui-Muslim Campaigns' in China from the 1910's to 1945”，《日本中东学会年报》。2003(18-2): 21。

⁹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 1。

回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都带来了严重危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采取的基本原则是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而对各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地区采取的基本政策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原则和基本政策的实施既确保了我国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和发展，又是我国挫败长期以来西方一些敌对势力始终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实施分化图谋的重要保证。可见，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政府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正确与否，是事关国家能否统一、社会能否稳定以及民族安危的重大问题。因此，在现阶段，为了维护祖国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宗教问题无小事的原则。

【论 文】

共产主义中国之前的国民党、穆斯林军阀 和“开发大西北”运动¹

林孝庭著 卢云译²

摘要：本文回顾了一个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民国时期（1928-1949）中国国民党向穆斯林统治的中国西北边疆的战略性进军。本文展示了最初虚弱的、只统治局部区域、以及战事不断的国民党政权是如何缓慢渗透进中国内地边疆的，南京政府虽然经常宣称对西北边疆拥有全部主权，但其行政命令在该地区是无效的。本文也显示了以国家建设和巩固政权的名义，国民党是如何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在中国边疆建立起以往不存在的权威。正如本文证明的，国民党政权在中国西北边疆的扩展，以及后来4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该地区的巩固发展，意外地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接管该地区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国民党 新疆 中国穆斯林 马步芳 盛世才 开发大西北

在1999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了西部大开发的宏大工程。这项事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1978年以来在全国经济发展中落伍的中国西部内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根据“依靠发展来促进稳定”的战略，北京通过在遥远广大的西部边疆发展区域经济、促进商业发展和国外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来保护国家统一和巩固边境安全。这个雄心万丈的工程几乎一夜之间就激发了普遍的兴奋和关注。尽管政府官员毫不犹豫地强调“向西部”发展对维护中国边界领土完整的

1 本文英文题目为 "Nationalists, Muslim Warlords, and the 'Great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刊载于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ume 5, No. 1 (2007), 第 115-135 页。译文刊载于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680.html> (爱思想网)

2 作者林孝庭博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译者卢云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重要性，但西部地区的居民普遍盼望着未来的投资能够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另一面，西方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很快表示赞成该项目，因为它们用现代化和改革的话语来制定目标。而在学术圈里，学者们则激烈地争论着西部大开发是否徒有其名。[4]

开发西部绝不是一个新概念。当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探究西部开发的议题时，我们发现在 1949 年以前的国民党执政时期（1928-1949 年），国民党当局已经努力着手一系列的“开发大西北”项目，其目的在于推动西北边疆的对外开放、充实人口和现代化。这个发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努力虽然有些被遗忘，但其在内容或范围上同当前方案一样雄心万丈和积极进取，曾经也激起了同当前一样的巨大期望和全国性轰动。

是什么因素促使政治权威仅限于中国本部的国民党发动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国民党是如何应付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大部分时间都有效统治了广大西北边疆的中国穆斯林军阀？这些发展西北计划的后果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以一个更宽广的地理-历史视角，国民党政府的西北开发工程对 1949 年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前共产主义中国时期西北边疆的发展过程，并试图揭示中国国民党在穆斯林统治的西北边疆伺机而动的进军过程。本文展示了虚弱且战事不断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如何缓慢地渗透进中国内地边疆，国民党政府虽然宣称对西北地区拥有全部主权，但其行政命令在该地区却是经常没有效力的。本文也显示了，以国家建设和政权巩固的名义，国民党是如何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在中国边疆逐步建立起了最初不存在的权威。正如本文将证明的，国民党权威在西北边疆的出现，在 1949 年后讽刺性和意外地为后来的共产党接管该地区铺平了道路。

寻求新的权力基础

1931 年 9 月，驻扎在韩国的日军在其指挥官命令下跨过中韩边界进入满洲南部并进攻在沈阳的中国军营。满洲的中国军队在年轻的张学良元帅指挥下没有给予日军太多抵抗，到 1931 年底整个地区完全被日本控制。1932 年春，由日本支持的满洲国成立，前清皇帝溥仪成为其名义上的统治者。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紧接其后的是中国与日本在上海的另一次军事冲突。1938 年 1 月 28 日，以保护租界为借口，驻扎在上海国际租界的日本海军突然与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交火。这场出乎预料的小冲突很快演变成日本对上海的全面轰炸和进攻。虽然停战协定于当年五月达成，但国民党政府被迫接受在大上海附近划出一片中立区，中国军队必须撤出该地区。[5]

由于日本对满洲和中国其他沿海地区的急剧军事扩张，国民党最高层开始为如何确保政权安全和生存而焦虑。30 年代初期的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似乎在未来不可避免。因此，国民党高层领导者迫切地认识到有必要寻找一个内陆权力基地，以承担长期抵抗日本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 30 年代早期，吸引国民党高层注意的是西北地区，而不是后来被国民党确立为战时陪都的西南地区。日本入侵上海后，国民党立刻宣布了中国的首都暂时从靠近上海的南京移到河南省的洛阳。虽然停火协定在上海缔结后，中央政府活动逐渐回到了南京，但陕西省首府西安被官方确立为中国的“西京”，一旦沿海战事再起中央政府将会迁到西安。[6]

除了国民党政府高官，中国本部的普通汉族民众和大众媒体也很快意识到了，在面临日本军事入侵的情况下开发大西北的战略需要。这一社会意识很明显地在逐渐增长，各种关于中国西北事务的社团、研究团体和出版社在九一八事件后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仅 1932 年一年，至少有 12 家有关西北事务的新社团在北京、南京、上海成立，每一家都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西部边疆。这些团体出版他们的杂志和期刊，向中国本部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系统性地介绍中国西北区域。一些组织良好的团体，例如上海的西北问题研究会，不仅吸引了学者和学生，还吸引了一

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例如当时的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有很大影响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张继。上海的西北问题研究会逐渐成为国民党政权就西北事务的重要的顾问委员会。[7]

30年代早期灾难性的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件发生后，中国社会舆论催促中央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把西北边疆纳入南京的行政控制下。社会舆论同样也提醒中国本部民众开发西北对维持民族生存的重要性。以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津《大公报》为例，1932年4月26日其社论指出，开发西北是面临战争的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一论断，以及后来的社论，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由于满洲的沦陷，中国本部不能得到安全保护。《大公报》同时指出，对国民党来说开发西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西南地区受到地方军阀无止境的战争的困扰，这些军阀只在表面上宣布效忠南京的中央政府。[8]

为了响应民众对开发西北的高度期望，1932年底国民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的建议，旨在推动中国西部边疆在经济、工业、林业、灌溉、农牧业和采矿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这个新规划，一个负责相关事务的具有部级地位的开拓委员会（Reclamation Committee）将很快建立，并在行政院直接领导下。尽管财政紧张，国民党政权宣布将会有大量的国家经费划拨给新政府部门以支持其行动。[9]正如预期的，这份建议受到广泛的赞同和欢迎，并立刻被认为明确地展示了南京把西北切实转变为对抗日本的坚固权力基地的坚定决心。

但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可能不经意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国民党在西北的影响力同在西南一样虚弱。从19世纪晚期开始，甘肃、宁夏和青海等西北省份被当地的马氏穆斯林家族控制。马氏家族控制了中国的中亚地区，实际上，他们开始成为独立的小朝廷。从民国建立到20年代底，马麒和马麟兄弟控制了河西走廊和青海，到30年代其地盘被马麒的儿子马步芳和马步青控制。马氏家族的另一支占据了宁夏和甘肃南部：马鸿宾在20年代占据甘肃南部，在30年代早期成为甘肃省主席。他的表兄弟马鸿逵在宁夏当权，1931年成为宁夏省主席并统治了接下来的15年时间。[10]

马家地盘的西面是中国中亚地区的另一省份新疆。新疆是一个辽阔的、遥远的、人口分散的地区，在1884年著名将领左宗棠平息穆斯林叛变并收复该地区之前，没有被清政府设立为行省。当地在族群和文化上都很独特，生活着大量的非汉族族群，他们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新疆与中国权力文化中心的遥远距离，以及交流和交通的内在障碍，使中国统治者极难把新疆和其他地区整合在一起。在1921年到1928年，新疆在前清官员杨增新的控制下，杨增新虽然承认北京民国政府拥有主权，但他实际上不受北京的制约。1928年杨在新疆被政敌刺杀，不得人心的继任者金树仁的统治比杨更腐败和无效率。1928年以后，金树仁支配的省政府更不听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新政权。在1933年春，金树仁的统治被马仲英领导的穆斯林军队所颠覆，而马仲英是统治中国中亚其他地区的马氏家族成员。[11]

金树仁1933年飞离乌鲁木齐后，盛世才因为在军事上的强大所以掌握了权力，南京最终也承认他为新疆的新领导者。但是，盛世才同样也独立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不久，盛世才采取亲善苏联的政策，因为新疆在经济和交通方面与苏联更加紧密。苏联向盛世才政权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持，而且不止一次地提供军事支持帮助其对抗中亚穆斯林敌军。盛世才从1933年开始统治这片广阔的土地。和他的前任一样，他只是在名义上服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12]

争夺土地与政治妥协

南京的蒋介石和幕僚们完全认识到，只要马氏军阀继续独立控制中国的西北地区，国民党将毫无机会来有效推行他们新提出的“开发大西北”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把西北地区逐渐转变成国民党的权力基地。但是在1933年夏天，一个机会出现了，这是权力有限的国民党自1928年上台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将权力扩展到马氏家族统治的西北。蒋介石的一个主要敌人冯玉祥为了打击南

京政府的声誉，在绥远省组织了一支联合军队以对抗日本侵略。[13]由于冯玉祥试图在中国西北建立对抗蒋介石的政治军事联盟，南京视其为威胁政治合法性的敌人，因此将不惜一切代价去镇压。驻扎在战略性的北京至绥远铁路线的孙殿英部仍然宣布效忠于南京政府，其此时对蒋介石集团非常关键。如果孙殿英加入冯玉祥的西北集团，南京将面临危险的境地。蒋介石认为有必要将孙殿英部离开这一危险地区，他以“殖民和开垦”荒地作为借口急令孙殿英部向西前往西北的青海。孙殿英认为这是蒋介石奖励他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所以立刻接受了命令。[14]

国民党政府的策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可以使孙殿英部远离冯玉祥集团。另一方面，以“开发大西北”的政治口号，南京操纵孙殿英部去削弱马氏家族权威，然后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但南京的精打细算却遭到了几乎所有穆斯林军阀剧烈反对。当听说可能到来的孙殿英部有6万人之众，青海省主席马麟要求南京政府收回命令。马麟不仅唆使当地藏人和蒙古人向南京抗议，他甚至威胁要辞去青海省主席。[15]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宣称由于“宁夏严重的农业歉收和粮食缺乏”，他将不允许孙殿英部通过宁夏前往青海。和马麟一样，马鸿逵也威胁如果蒋介石不收回“错误的”命令他就辞去宁夏省政府主席的职位。[16]

因为面临穆斯林军阀的极大压力，权力有限但又秉持机会主义策略的南京政府决定放弃他们利用孙殿英作为渗透西北工具的企图。1933年11月，由于西北地区日益增长的骚乱，蒋介石最终退步。他命令孙殿英部缓慢地向绥远-宁夏边境移动，然后在那里等待南京的进一步命令。同时，孙殿英的部队陷入绝境并即将面临粮食短缺，已经士气低下而且显示出情绪不稳定迹象。[17]这一危急局面促使孙殿英最终自行其是。在1934年初期，孙殿英不顾蒋介石的公开命令，命令其部队西进穿越宁夏边界，因此立刻导致了与驻扎当地的马鸿逵穆斯林军队的军事冲突。为了保护他们在西北的共同利益，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氏家族成员都派遣部队增援宁夏对抗孙殿英部。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认识到无法再利用孙殿英来对抗西北军阀，他见风使舵地改变态度，命令马氏家族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惩罚“顽固的”孙殿英。在这场军事冲突的背后，南京甚至向马鸿逵送去包括侦察机在内的精良军火，以帮助其对抗孙殿英。在三月，孙殿英的部队被击败并且最终并入陕西省卫戍部队。[18]

孙殿英事件对国民党政权的威信造成巨大损害。这次事件也促使南京高级官员们认识到，马氏家族在中国西北拥有稳固的权威，很难用军事方式将他们轻易征服。因此，蒋介石决定放弃使用极端方式，从此次事件后采取和平渗透来加强国民党的影响。[19]另一方面，蒋介石在这次军事冲突中最终与穆斯林的妥协却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当西北大草原尘埃落定后，马氏穆斯林军阀继续承认南京在名义上拥有主权。不仅如此，为了回报蒋介石放弃支持孙殿英，马氏军阀第一次公开宣称他们愿意接受国民党高级官员以检查和调查“开发大西北”项目执行情况为名义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20]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从1934年春开始到年底，大量的国民党官方要员为了执行“检查”任务而频繁来往于南京和西北。1934年4月，蒋介石最信任的边界顾问戴传贤到达青海省会西宁，他是第一个到达此地的国民党高级官员。[21]紧接着，蒋介石的连襟，当时负责中国经济和财政计划的宋子文和孔祥熙也出访西北。宋子文特地巡视了马氏家族统治的整个地域，包括甘肃南部，青海省和宁夏省。宋子文在这些地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会见了当地所有有影响力的地区要员。在宋子文西北之行结束不久之后，南京宣布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在兰州建立一个分支机构，以执行该地区的发展计划。[22]同时，南京还热烈讨论了把中国本部过多汉族人口迁往西北耕作开垦的可能性问题。另外，国民党政府宣称有更多的财政资助分拨给马氏家族，但这将根据他们与国民党共同开发西北的合作意愿而定。[23]

在1934年秋，蒋介石亲自前往穆斯林控制的西北地区视察。尽管缠身于他近期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军事围剿，蒋介石还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巡查西北和内蒙古的边界地带。在他停留在陕西、甘肃和宁夏期间，他公开表达自己把整个西北转变为中华民族生存的战略基地的决心。他

呼吁同胞“向西部进军”，希望使国人意识到过去因忽视这片富饶土地所犯下的错误。同时，蒋介石煞费苦心希望使穆斯林军阀们相信与南京合作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希望他们准许国民党的资本、技术和南京任命的人员进入他们的辖地。[24]

从事后可以看出，1934年至1935年南京官员接连高规格访问没有促使西北转变为国民党的后备权力基地。而且，也许国民党领导层在穆斯林统治地区的经历使他们认识到，中国西北地区由于严酷的气候条件、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时有发生饥荒，的确不是抵抗日本全面入侵的理想后方。[25]但是，国民党官员对西北的访问以及政府支持的边界调查团队的派遣，立刻在社会上产生了如下认识：面临战争威胁的国民党政权确实致力于开发中国的西北边疆，国民党确实希望在西北建立更加牢固的统治。虽然国民党在该地区的权威仍然是脆弱的和徒有其名，但国民党对西北“名义上”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提高了其威信。[26]

打破穆斯林的阻碍

直到1935年蒋介石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中国西南地区以前，开发西北和把该地区转变为国民党新的战略基地的兴趣一直在中国本部广为存在。中国共产党在1934年底开始的长征，给蒋介石一个前所未有的将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插入西南省份的机会。为了追击撤退的共产党，蒋介石装备精良的部队进入湖南、贵州、四川和云南。由于极端惧怕共产党带来的威胁，当地独立的军阀们很不情愿地准许国民党中央军帮助他们驱逐红军。蒋介石充分利用了此次机会，在该地区开始了政权巩固和国家政权建设。一旦国民党中央军进入某个省份，南京任命的当地代理人就开始强制推行改革以打破本地区的独立。[27]例如在四川，作为地方军阀们政治经济基础的防区被废除，代之以更加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系统。大量公路建设项目被启动，旨在使该省在政治军事上与全国其他地区整合为一体。由于国民党法币的广泛使用，四川最终在经济财政上也纳入南京的控制。作为1935-1936年国民党剿共运动的结果，曾经政治上自治灵活的西南军阀们被急剧削弱，国民党中央政权的权力和威信得到加强。[28]

对西南地区的成功渗透使得国民党选择四川作为对抗日本侵略的内陆基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随着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全国重心从沿海转到了西南。但是，穆斯林控制的西北地区对陷入战争困境的国民党政权仍然具有战略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在战争的最初阶段，苏联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向蒋介石提供实质性援助的国家之一，苏联的军事装备和其他必要的战争物资必须通过中亚才能运达四川。中亚连结着苏联和被日本包围的中国西南地区，因此其具有地理政治重要性，其对中国和国民党政权的生存安全非常重要。[29]

此外，在1939至1940年期间，在曾经名不见经传的玉门成功发现油田以及在青海和甘肃其他地区可能也会发现石油的新闻，增加了西北地区的军事、战略和士气上的重要性。到40年代初，对重庆的蒋介石和参谋人员来说，把马氏家族统治的西北地区纳入国民党的控制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国民党最高政治安全参谋人员秘密计划扩大青海、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在战前已建立的地下情报单位，并考虑在云南西部、新疆北部、西康和西藏地区建立新的站点。蒋介石和军事参谋人员也在考虑向穆斯林统治的宁夏和甘肃交界处派遣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以此作为控制整个西北的第一步。[30]很明显，因为蒋介石和其属下把政权安危作为首要关注，他们感到有必要在西部地区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加强巩固国民党徒有其名的权威。

1942年，重庆赶走了河西走廊的穆斯林军阀马步青，这是其在该地区第一次成功地建立起统治。和过去一样，精心策划的渗透战略，即使不是全凭运气，也是依靠机会主义才得以实现。陷入困境的马步青和其骑兵部队驻扎在其兄弟马步芳控制的青海和表亲马鸿逵控制的宁夏之间。早在1941年初，蒋介石就意识到马步芳与其兄弟马步青交恶，盘踞在河西走廊的马步青逐渐被马步芳视为家族内的竞争对手。蒋介石因此说服马步芳与重庆合作，帮助国民党控制河西走廊。

作为回报，蒋介石答应帮助马步芳接管马步青的军队，并结束他兄弟在西北的军事政治生命。[31] 蒋介石还向马步芳承诺，只要完成他们的交易，重庆将会给予西宁更多的财政拨款。蒋介石还答应马步芳，国民党将很快向其青海的私人产业投资大量的资金。[32] 很明显，马步芳对蒋介石的条件很满意。

因此，1942年夏天，蒋介石命令马步青将部队开往青海西北的柴达木马什去开垦和保护那里的荒地。[33] 这很像十年前蒋介石给孙殿英下达的命令，但这次发生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政治战略环境里。毫无准备的马步青被局势的突然转变所震惊，他立刻向其他马氏家族成员求助。正如蒋介石所料，他没有获得任何帮助。由于无法从青海的兄弟和宁夏的表亲那里获得支持，沮丧的马步青只能遵从蒋介石的命令。1942年夏天，根据当时呈交蒋介石的一份报告，马步青率三万名穆斯林骑兵离开河西走廊的军营，穿过祁连山到达青海西北。这次事件结束了马步青长达25年的叱咤风云。[34] 在此之后，蒋介石嫡系国民党中央军立刻进入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戍守在黄河西岸的这片长条形土地。根据后来一位外国观察者的报告，“国民党部队驻守在每一个城市，甚至远至中亚沙漠里的居民点”。[35]

从河西走廊成功驱逐出马步青，以及成功打破西北穆斯林军阀联盟，使得自信满满的蒋介石于1942年夏再一次开始了对河西走廊和军阀统治的青海、宁夏的不切实际的考察。[36] 在他访问这些地区期间，蒋介石再次催促这些顽固的穆斯林军阀与重庆坦诚合作，共同对抗日本。蒋介石还特地抽出时间前往青海拜访当地的穆斯林部落和蒙古、西藏的贵族，他们只是向中央政权象征性地进贡，而且有可能已经暗地与日本结盟。[37] 在宁夏期间，蒋介石公开地呼吁当地穆斯林上层与国民党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他向省主席马鸿逵承诺，重庆将会给予宁夏更多的财政资源。作为回报，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军事政治事务上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38]

毫无疑问，西北的马氏家族欢迎蒋介石中央政权的军事和政治援助。但是，国民党在西北地区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迅速增加，将不可避免地给当地穆斯林统治者带来压力。在蒋介石的考察结束之后，（为了监督当地事务，）国民党政府官员、军事顾问和政治组织不仅出现在国民党控制的河西走廊，也出现在青海和宁夏。著名的玉门油田已经完全被重庆任命的官员掌握。甚至在最遥远的中国和内蒙古边界的阿拉善旗，也驻扎着国民党委员会和蒋介石政府军事基地的一系列分支机构。[39] 到1942年底，重庆的政治压力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顽固的穆斯林军阀马鸿逵被迫命令宁夏的穆斯林阿訇（宗教导师）把国民党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纳入日常布道中。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和统治邻近地区的共产党的影响。[40]

作为战时中国应许之地的西北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使中国、美国、苏联和英国组成反抗轴心国的同盟国。重庆在理论上不再是单枪匹马地战斗了。1942年初，自称战无不胜的苏联红军在东欧遭到德国的沉重打击，莫斯科顿时无暇顾及遥远的中亚事务。在另一边，由于估计希特勒将最终战胜苏维埃俄国，麻烦缠身的斯大林不可能再提供任何支持，独立的新疆统治者盛世才决定从先前的亲莫斯科政策转变为反共立场。奸诈的盛世才很快发现，修补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最符合其利益，因为蒋介石现在受到美国在外交、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41]

因为中国西北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化，蒋介石政权又获得一个在新疆建立起权威的绝佳机会。重庆和乌鲁木齐展开了秘密协商，直至1942年夏盛世才和蒋介石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很快，盛世才发表了与蒋介石结盟的正式宣告。作为盛世才愿意与国民党合作的回报，蒋介石承诺将不追究盛世才“过去在新疆的错误行为”，并保证盛世才在乌鲁木齐的地位不被侵犯。[42]

到1942年底，在盛世才的坚持下，苏联军队和技术人员开始撤离新疆，代之而来的是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和财政势力。已经驻扎在河西走廊的国民党部队跨越了甘肃和新疆的边界，最终

到达哈密，替代了苏联著名的“第八军团”。这场胜利象征着重庆控制新疆的初步胜利。[43] 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发现其对国民党收复新疆的喜悦。在 1942 年 12 月 21 日，蒋介石写道：

从甘肃兰州到新疆伊犁的土地，跨越了三千公里，面积两倍于满洲，现在已被中央收复。随着中央控制了新疆，我们的后方被巩固了。[44]

到 1943 年底，当盛世才意识到莫斯科战败不仅不是迫在眉睫、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生时，他试图再次改变亲国民党立场。但是这一次盛世才没有成功。在 1944 年秋，重庆宣布不再被斯大林信任的盛世才被免职，替代他的是一名蒋介石的心腹。[45] 这次变动不仅结束了盛世才在新疆的独裁统治，也标志着自 1911 年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恢复控制了中国最西北的地区。

随着其权力在西北地区的增长，国民党政权认为有必要于 1942 年至 1943 年在新疆展开早已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达到巩固其地位的目的。[46] 重庆高层也相信，必须鼓励西南地区有能力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献身于这片“新获得的”西北边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国民党官员在四川和西北边疆频繁往来，他们致力于巩固国民党政权在当地的行政控制。[47] 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公务员参加战时的“向西部进军”运动，财政高度紧张的国民党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条例，给予志愿前往新疆服务的公务员优厚的待遇。[48]

令人感兴趣的是战争期间国民党高层是如何把辽阔而人烟稀少的新疆描述为陷入战争困境的中国人民的“应许之地”。由于西南地区面临人口过多的问题，国民党政策制定者认为有必要启动把四川汉族人口前往边疆的老想法。官方宣传和政府支持的出版物都努力把新疆描绘为可以为移民提供土地、自然资源和希望的处女地。[49] 国民党还试图把“向西部进军”运动与爱国主义相联系，其宣称到西部开垦新疆就是帮助政府抵抗日本。重庆的领导人特别催促四川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贡献给西北边疆。[50]

战时国民党政权的向中国西部边疆展开了充满机会主义的进军，作为其结果，国民党的第二次“开发大西北”计划在 1942 年至 1944 年期间达到巅峰，但在同时，国内外也出现对该计划的批评。例如，在战时中国的英国外交官认为，中国对西北进行工业化和开发自然资源的企图，以及他们对西北开发项目的大力宣传，只不过是抵抗日本侵略以及未来与中国共产党甚至苏联斗争，所以向美国索取财政和技术支持的另一个工具。因此对于英国政府而言，中国西北最终只是“中国人试图向美国人兜售的又一块金砖”。伦敦和重庆的英国官员都相信，由于重庆缺乏技术和财政资源，西北在战时和战后很难被很好地开发。[51]

尽管有这些负面的评论，应当公正地认为，国民党至少还是获得了部分成功。在 1943 年早期，重庆在新疆东部推动了一项大规模的土地开发计划。超过两万名汉族人，大部分是河南、陕西和陕西的难民、复员军人和失业者，前往哈密和吐鲁番进行开垦工作。[52] 一系列的经济和移民工程被实施，不仅旨在解决西南地区过多的人口，也是为了加强国民党对边疆的行政控制。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在新疆东部、河西走廊、宁夏和青海为中国本部的汉族移民建立的若干军事移民区。这些移民负责公路建设、灌溉、林业、和土地开垦等任务。为了监督这些移民和工程，重庆派遣官员前往督察，因此加强了国民党对该地区的影响。[53]

国民党政权也鼓励西南地区的党员、公务员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前往边疆服务。根据一份统计报告，到 1943 年中期，至少有 7200 名国民党新干部前往新疆，服务于国民党最近设立的组织机构。为了促进更多的人前往边境省份服务，国民党中央颁布了新的法令和条例以示支持。在重庆，政府为即将前往新疆工作生活的公务员开设了培训课程。[54] 另外，国民党高级官员也频繁地来往于四川和边疆省份去执行检查任务，这肯定会提高国民党政权的威信。1943 年到 1943 年间，重庆前往西北的高级官员如此之多，以至于驻守兰州并负责这些显贵们安全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不得不向蒋介石抱怨这项意外任务过重。[55]

后记

到中日战争后期的 1945 年夏，大部分中国的西北地区都已经在国民党比较有效的控制之下。只有新疆北部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例外。[56] 甘肃和新疆都被蒋介石信任的心腹所控制。虽然青海和宁夏仍然被马氏穆斯林家族统治，但国民党下辖的组织已遍及两省。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财政和经济力量不断增加，以致其有能力在新疆北部和南部任何地区建立海关。国民党试图直接控制新疆的税收和贸易，这个政策在战前还是完全不现实的。国民党的战后政策制定者计划在乌鲁木齐建立海关，并在阿勒泰、塔城、伊宁、吐鲁番和喀什建立分支机构。这样，国民党政权就可以逐渐控制新疆与苏联、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和税收。[57]

从后来看，与日本的战争向国民党提供了向遥远的、穆斯林统治的中国中亚边疆扩展权威的意料之外的机会，而战前国民党权威在那里根本不存在。到 1944 年底，在帕米尔边境的绿洲城市塔什库尔干的所有市政官员，包括警察局长、海关和邮局的负责人都是直接由重庆任命。[58] 到 1945 年夏，至少有三支国民党部队驻扎在靠近克什米尔的遥远边界。二战结束后，国民党在当地的势力大为增强，以至于筋疲力尽的英属印度当局开始抱怨由国民党支配的新疆省政府已经垄断了新疆与印度的贸易。[59]

国民党向西北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完全可以认为，国民党在战争期间逐渐建立的政治、军事和财政影响以及基础设施，讽刺性地为共产党控制西北铺平了道路。特别是在新疆，国民党军事力量在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在 1949 年的关键时刻，指挥着国民党驻新疆的超过 8 万名精锐部队的指挥官陶峙岳最终决定向中国共产党投诚。[60] 如果没有新疆汉族政权的政治帮助，共产党接管新疆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而且完全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暴力冲突。新的北京政府是否有效地巩固了其在西北的权力仍然饱受争议。

从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开始，由于东部面临日本军事侵略，中国本部的民众对发展西北非常热情。国民党政权也认为非常有必要把辽阔的西北转变为新的权力基地。与日本的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选择了西南的四川作为战时基地。但是，西北地区仍然对国民党具有优先重要性。通过国民党在中国长达 20 年的统治，“发展西北”的观念已经成为其政治战略、政党议程和官方项目的一部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国民党达到其目的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机会主义的，混合了恰当的时机、政治妥协和军事伎俩。

注释：

[4] 有关自 20 世纪 90 年代底开始的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研究文献，可以参见：Yasuo Onishi ed.,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sues and Prospects*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1); Abigail Sines, "Civilizing the Middle Kingdom's wild west," *Central Asian Survey* 21, 1 (2002), pp. 5-18; Ding Lu & William A. W. Neilson eds., *China's West Region Development: Domestic Strategie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4).

[5] Lloyd E. Eastman, Jerome Chen, Suzanne Pepper and Lyman van Slyk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 120;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388-396.

[6] "Important resolutions approved in the 4th KMT Central Committee", March 1932, in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Zhonghua Minguoshi Dang'an Ziliao Huibian 《中华民国史档案汇编》(Collection of Republican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archives) (hereafter, ZMDZH) (Nanjing: Jiangsu guji chubanshe, 1994), 5: 1, Politics (2), p. 365.*

[7] Shen Sherong, "Jiu-yi-ba Shibian Hou kaifa Xibei sichao di xingqi" (The rise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on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Ningxia Daxue Xuebao* 《宁夏大学学报》(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Ningxia) 4, (1995), pp. 9-15. 该时期其他重要的研究西北事务的社团包括 the Northwest Association 西北协社 (Xibei Xieshe) and Society for the Northwest Public Studies 西北公学社(Xibei Gongxueshe) in Beijing, the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Association 开发西北协会(Kaifa Xibei Xiehui) in Nanking, and the Northwest Public Forum Association 西北公论社(Xibei Gonglunshe) in Shanghai.

[8] Editorial entitl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west," 《大公报》 (The Impartial Daily) (Tianjin), April 26 1932.

[9] "Outlines of the sche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Executive Yuan, dated December 19 1932, in ZMDZH, pp. 391-392.

[10] 有关中国西北马氏家族历史的研究文献,参见 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esp. chapters 4 and 5; A. Doak Barnett, *China's Far West: Four Decades of Chang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3); Qinghai Provincial Government ed., *Qinghai San Ma* 《青海三马》(The three Mas in Qinghai)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1988).

[11] 参见 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3-20; 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sp. chapter 4.

[12] 有关新疆共和主义历史的全面完整的研究文献, 参见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3]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received by the U. S. War Department, May 31 1933, in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China, 1911-1941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83), microfilm (hereafter, USMIR), reel 5.

[14] 参见 Sun Dianying's dispatches to Lin Sen (Head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Premier Wang Jingwei, June 17 1933, in *Minguo Dang'an* 《民国档案》(The Republican Archives) (Nanjing), 1994 (4), p. 27;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U. S. War Department, received July 19 and August 10 1933, USMIR, reel 9.

[15] Ma Lin to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June 30 1933; The Qinghai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July 2 1933; Ma Lin to Lin Sen, July 5 1933 in *Minguo Dang'an* 《民国档案》, pp. 28-29.

[16] 参见: Ma Hongkui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eptember 21 1933, and Ningxia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the Executive Yuan, October 10 1933, in *Minguo Dang'an* 《民国档案》, pp. 33, 35.

[17] Sun Dianying to Wang Jingwei, October 11 1933, in *Minguo Dang'an* 《民国档案》, p. 36.

[18] 参见: Wang Jianping, "Xibei Si Ma Heji Sun Dianying di Huiyi" (A reminiscence of the joint attack on Sun Dianying by the four Mas of the Northwest), in ed., *Ningxia San Ma Government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The three Mas in Ningxia) (Beijing: Zhongguo wenshizhe chubanshe, 1988), pp. 169-180; Shen Sherong and Guo Yingchun, "Sun Dianying Tunkun Qinghai Wenti zai Renshi" (Reconsidering the issue of Sun Dianying's reclamation of Qinghai), in *Guyuan Shizhuan Xuebao* (Journal of Guyuan Teachers College) 5 (1998), pp. 18-22.

[19] Yang Xiaoping, *Ma Bufang Jiazou di Xingshuai* 《马步芳家族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 Bufang family) (Xining: Qi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86), pp. 107-121; 《青海三马》 Qinghai San Ma, pp. 200- 201.

[20] Gao Yi, *Jiang Jieshi yu Xibei Si Ma* 《蒋介石与西北四马》(Chiang Kai-shek and the four Mas in the Northwest) (Beijing: Jingcha jiaoyu chubanshe, 1993), pp. 84-101; Hao Weimin ed., *Neimenggu Jindai shi* 《内蒙古近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Inner Mongolia) (Hohhot: Neimenggu Daxue chubanshe, 1990), pp. 120-129.

[21] *Zhongyang Ribao* 《中央日报》(Central Daily) (Nanking), April 15 1934, p. 2; Dai Chuanxian's personal letter to Chiang Kai-shek, April 30 1934, in Chen Tianxi ed., *Dai Jitao Xiansheng Wencun Xubian* 《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

(The sequel of Mr. Dai Jitao's documents) (Taipei: Kuomintang Historical Committee, 1967), p. 176.

[22] Zhongyang Ribao 《中央日报》, May 2, May 9, May 15 and June 22 1934; Shen Bao 《申报》 (Courier Mail) (Shanghai), May 9 and 10, 1934.

[23] Mi Zhizhong, "Jushi Zhumu zhi Xibei" (A Northwest that catches world-wide attention), in Tuo Huang (Reclamation) (Nanking) 2, 3 (1934), pp. 3-10; Zhang Naiwen, Yi-jiu-san-liu Nian 《1936年》 (The year 1936) (Shanghai: Lehua shuju, 1936), pp. 293-299.

[24]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U. S. War Department, received September 26 1934, USMIR, reel 9; "Jiang Wei yuanzhan dui Ningxia Gejie Xunhuaci" (The Generalissimo's admonitory talk to all circles in Ningxia), in Kaifa Xibei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Nanking), 2, 4 (1934), pp. 1-3; "Jiang Wei yuanzhan Xunxing Gesheng hou zhi Guangan" (Some thoughts of the Generalissimo after his inspection tour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ibid.*, 2, 5 (1934), pp. 1-3.

[25] Sheng Shengrong, "Jiang Jieshi di Xibei Zhanlueguan" "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 (Chiang Kai-shek's strategic views on the Northwest), *Guyuan Shizhuan Xuebao* 1 (2003), pp. 53-58.

[26] 中国媒体对国民党开发西北运动的积极评价, 可参见: Da Gong Bao, the editorials for August 13 and 14 1936; Sheng Ran, "Xibei Jiaotong Jianshe zhi Wojian" (My opinion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in the northwest), in *Bianjiang 《边疆》* (Frontier biweekly) (Nanking), 1 (1936), pp. 12-19.

[27]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U. S. War Department, received April 9 1935, USMIR, reel 9; Eastman et al.,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pp. 32-36.

[28] 有关南京政府加强对四川行政控制的研究文献, 参见 Robert A Kapp, *Szechwan and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99-120.

[29] Owen Lattimore, "China's Turkistan-Siberian Supply Road," in *Pacific Affairs* 13, 4 (December 1940), pp. 393-412; Martin R. Norins, "The New Sinkiang-China's Link with the Middle East," *Pacific Affairs* 15, 4 (December 1942), pp. 457-470. 有关中日战争初期的中苏关系的研究文献, 参见 John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0] 参见: The Kuomintang Party Archives 《国民党档案》 (Taipei), Archives of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hereafter, ASNDC), 003/103,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administrative schedule for the second stage of war", April 1939;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rchives, Choubi (Plans and Directives) (hereafter, CB), 08-0541,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s to Zhu Shaoliang (Commander of the 8th War Zone), January 23 1938; 08-1408, Chiang to Zhu, January 23 1939; 08-2298, Chiang's secret dispatch to He Guoguang (Director of the Generalissimo's Field Headquarters in Sichuan), January 20 1940.

[31] Jin Shaoxian, "Yishu Guomindang Yuanlao Wu Zhongxin" (A memorial narration of the KMT veteran Wu Zhongxin), in *Wenshi Ziliao Xuanji* (Selections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118 (1989), pp. 118-119.

[32] Yang, Ma Bufang Jiazhu di Xingshuai, pp. 190-212; Public Record Office, War Office Records (WO), 208/268, Office of Military Attaché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the British War Office, November 12 1942; FO 436/16518 F5103/254/10, Report from Teichman in Lanzhou to Sir Horace Seymour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September 3 1943, enclosed in 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September 14 1943.

[33] CB, 09-1406,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 to Ma Buqing, July 19 1942.

[34] WO 208/428, "Moslem soldiers in Tsaidam Basin: Guarding Flank of China's Northwest Road", extract from *China Newsweek* 8 (October 24 1942).

[35] FO 436/16605 F6275/254/10, Report from Teichman in Tihwa (Urumqi), dated September 24 1943, enclosed in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14 1943.

[36] WO 208/268, "China News", issued by the London Office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dated September 22 1942.

[37] 参见: Chiang Kai-shek's speech to the non-Han elites in Xining, in Qin Xiaoyi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General collections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thoughts and speeches) (Taipei: Kuomintang Historical Committee, 1984), 19, pp. 216-218; *Zhongyang Dangwu Gongbao* (Gazette of the KMT central party affairs) (Chongqing) 4, 19 (September 1942), pp. 23-24; *Zhongyang Zhoubao* (The KMT central weekly) (Chongqing) 5, 19 (December 1942).

[38] Chiang Kai-shek, "Ningxia Junshi Huibao Xunci" [A speech of admonition for the military briefing in Ningxia], dated September 2 1942, in Qin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Vol. 19, pp. 219-228; FO 436/16373 F7411/1689/10, 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5 1942.

[39] Qi Tao, "Gaishu Guomintang Zhengfu dui yuan Alashan qi di Tongzhi"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KMT's rule over Alashan Banner), in *Alashan Meng Wenshi* 《阿拉善盟文史》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lashan League), 2 (1986), pp. 49-80.

[40] Wu Zhongli ed., *Ningxia Jindai Lishi Jinian* 《宁夏近代历史纪年》 (The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modern Ningxia) (Yinchuan: Ningxia renmin chubanshe, 1987), pp. 286-291; Hu Pingsheng, *Minguo Shiqi di Ningxiasheng* 《民国时期的宁夏省》 (Ningxia Provinc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aipei: Xuesheng Shuju, 1988), pp. 153-185.

[41] Whiting and Sheng, *Sinkiang: Pawn or Pivot?* pp. 51-53; Harriet Moore, "Soviet Far Eastern Relations since 1941," *Pacific Affairs* 17, 3 (September 1944), pp. 294-310.

[42] CB, 09-1413, Chiang Kai-shek's secret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Chongqing's negotiation with Sheng Shicai, July 1942.

[43]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p. 157-162; Svat Soucek,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1-272.

[44] 参见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1), pp. 744-745.

[45] Chen Huisheng and Chen Chao, *Minguo Xinjiang Shi* 《民国新疆史》 (A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 (Urumqi: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99), pp. 376-382.

[46] ASNDC, 003/2352,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to the Executive Yuan concerning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December 31 1942.

[47] Ze Ren, "Lun Bianjiang Gongzuo zhi Zhanwang" (On the prospect of frontier dealings), *Bianzheng Gonglun* 《边政公论》 (Frontier Affairs) (Chongqing) 3, 12 (December 1944), pp. 1-3; Jin Shaoxiang, "Guomintang Fandong Shili Jinru he Tongzhi Xinjiang" (The entry of KMT anti-revolutionary influence into Xinjiang and its governance in this province), in *Xinjiang Wenshi Ziliao Xuanji* (Selections of Xinjiang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2 (1979), pp. 18-73.

[48] ASNDC, 003/1763, "Guidelines for the youth and personnel affairs on the frontiers", enclosed in the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September 3 1941; 004/114, "Regulations concerning provisions of the staff working on the frontiers", enclosed in the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April 25 1944.

[49] 参见: "Guidelines for the KMT frontier affairs", *Zhongyang Dangwu Gongbao* 4, 19 (September 1942), pp.23-24; Zhao Minqiu, *Yuejin zhong di Xibei* (The leaping Northwest) (Chongqing: The New Chinese Culture, 1940).

[50] Chiang Kai-shek, "Kaifa Xibei di Fangzhen"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in Qin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19, pp. 169-181; Zhu Jiahua (Head of the KMT Organizational Department), "Frontier issues and frontier works", *Zhongyang Zhoubao* 5, 19 (December 17, 1942), pp. 26-32.

[51] WO 208/408, "China: Political and General Conditions in Kansu [Gansu] and Chinghai [Qinghai] Provinces", M.I.6. Political Report, dated June 28 1943.

[52] ASNDC, 003/2352,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to the Executive Yuan concerning the removal of

refugees from Hena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December 31 1942; 003/2361, Executive Yuan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February 22 1943.

[53] ASNDC, 003/2359,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to the Executive Yuan, December 30 1942;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Yuan concerning the execution of im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projects in the border provinces, May 7 1943; T.V. Soo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25, "Bluepri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west for the fiscal year 1943", proposed by the Central Planning Bureau, November 1 1942.

[54] Academia Historica, Archiv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0128.12/3611.01-02, "Statutes concerning public servants in the frontier", May 18 1943. 在对即将前往新疆工作的官员的演讲中, 蒋介石特地强调他们应当避免与盛世才的下属发生冲突, 应当充分尊重当地的少数民族群。参见: Chiang, "Dui Paifu Xinjiang Gongzuo Tongzhi zhi Zhishi" (Instructions to the party cadres dispatched to Xinjiang), in Qin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19, p. 403.

[55] ASNDC, 003/2439, KMT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to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March 19 1943.

[56] 1945 年秋新疆北部发生了反抗国民党政权的动乱, 1945 年春夏期间得到苏联强力支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 其控制了天山以北的区域。1945 年夏蒋介石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政治交易促成了一个艰难的妥协, 国民党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形成联合政府, 由负责新疆省政府的国民党将军张治中领导。参见: David Wang, *Clouds Over Tianshan: Essays on Social Disturbance in Xinjiang in the 1940s* (Copenhagen: NIAS, 1999), and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New York: M.E. Sharpe, 1990).

[57] 参见: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OIOC), British Library (London), L/P&S/2406, British Consulate at Urumqi to the British Embassy (Chongqing), January 13 1944; Mr. Ting Guitang (Deputy Inspector-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at Urumqi) to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Urumqi, February 12 1944.

[58] OIOC, L/P&S/12/2407, Travel reports by K. P. S. Menon (Indian Agent-General to China)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October 25, December 19 and 29 1944.

[59] OIOC, L/P&S/12/2407, Report of Mr. Etherington-Smith (British Consul-General at Kashgar), enclosed in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23, 1945; L/P&S/12/2405, British Consulate in Urumqi to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September 2 1945.

[60] Wang Fen, "Zouxiang Guangmin-Huiyi Zhao Xiguang Shuaibu Qiyi Qianhou" (Heading for the brightness-A remembrance of Zhao Xiguang's leading troops to revolt), in *Xinjiang Wenshi Ziliao Xuanji* 《新疆文史资料选集》, Vol. 3 (1998), pp. 109-115; Fang Yingkai, "Mianhuai Zhao Xiguang Jiangjun" (In memory of General Zhao Xiguang), in *Kashi Wenshi Ziliao* 《喀什文史资料》 (Kashgar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Vol. 5 (1990), pp. 61-74.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119 期均可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